

中国人大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邮发代号：2-18
国内刊号：CN11-3442/D
国际刊号：ISSN1671-542X

半月刊
2010年第12期
6月25日出版 总第264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刊物



法律关怀下的 妇女权益保障

ISSN 1671-542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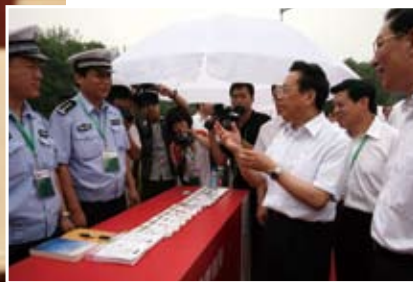
9 771671 542021



◀ 6月2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国民议会议长阿夸耶。
摄影/鞠鹏



◀ 6月9日，华建敏副委员长在北京西城区展览路第一小学与小学生一起做包扎伤口演练。摄影/曾利明



◀ 6月13日，陈昌智副委员长在2010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了解北京交通安全情况。图/CFP



▶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克明询问。摄影/马增科



◀ 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回答委员的询问。摄影/马增科



▲ 6月2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时进行了专题询问。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多位负责人到会回答询问。图为专题询问现场。摄影/李杰



◀ 部分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在黑龙江进行的清洁生产促进法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供稿）



◀ 山东省枣庄市的大学生村官满婷婷在村里办起“普法茶座”，引导村民依法维权，帮助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摄影/刘明祥



▲ 6月17日，“依法禁毒，构建和谐”的主题禁毒绘画比赛在南京市雨花台区青少年中展开，以帮助孩子们从小树立“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的意识。图/CFP



◀ 在广州市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当天，广州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和市国税局、地税局等40多个单位集中在会议现场接受人大代表咨询。摄影/卢汉欣



关注各阶层妇女的利益诉求

丈夫酗酒后实施家暴,令薛玲苦不堪言,她先是忍,后来觉得这种生活遥无止境,比招致流言蜚语更为可怕,于是她毅然离了婚。薛玲命里注定离不开农村了,岁数大、文化低,要过好余下的日子,她寻思还是得把土地好好打理一番。然而不久,她却发现承包地被人收走,“离婚妇女没理由享有土地及经济利益”,这个说法让她十分不解,这时同村一个姐妹找上门来,因为出嫁她也不幸丢了土地,于是俩人一合计,结伴上访到了省里。

薛玲姐妹的遭遇,是典型的违法案例,但在农村却时有发生,极大地损害了妇女的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时,遂将其列为重点推动解决的突出问题。

今年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一百周年,作为纪念,本次执法检查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而把关注各阶层妇女的不同利益诉求作为要点,正好可以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后实施5年的情况做一次全面盘点。执法检查报告给出的建议十分明确,在工作中均可成为硬性指标。这是近年来全国人大监督法律实施形成的规范,着实推动解决了一大批问题。比如薛玲姐妹的困惑,报告指出她们失去土地,实质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这是集体经济权益分配的争议焦点,也是解决纠纷、维护她们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条件和关键。报告建议抓紧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并在目前审议修改的村委会组织法中增加相应条款。

对于其他阶层妇女利益的诉求,报告同样给出建议,比如在各地制定选举法实施办法时,规定增加女性候选人数量;在制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时,提高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领导干部中女性所占比例;尽快修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尽快对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和处级以上女干部的退休政策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等等。

风云诡谲,百年沧桑。世界妇女的命运始终随国家民族的命运上下起伏,事业也始终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联在一起。对中国妇女而言,只有新中国成立,才奠定了“半边天”地位,才将男女平等与人口、资源、环境等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同等对待,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如今,中国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建设巨大的人力资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更是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胡锦涛指出:“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全人类的解放,没有妇女的进步,就没有全社会的进步。”这也正是贯彻实施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内涵所在。而另一角度来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妇女哪有母亲,没有母亲世界将不复存在。

所以,为了各阶层妇女应有的平等,我们遵循法律,做什么都不为过。

徐燕

主办单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编辑出版 中国人大杂志社

中国人大

2010年第12期
6月25日出版
总第264期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 任 李建国
副 主 任 王万宾
委 员 马启智 王云龙 王庆喜 白克明
(按姓氏笔划排列) 石秀诗 乔晓阳 孙 伟 何晖晖
张少琴 李连宁 李适时 李肇星
汪光焘 沈春耀 胡康生 高祀仁
曹卫洲 黄镇东 韩晓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连宁
委 员 王 平 孔 平 冯 键 朱学庆
(按姓氏笔划排列) 何绍仁 吴高盛 张聚宁 杜世伟
汪铁民 郑淑娜 赵 杰 徐 燕
郭 瑞 高 奇 阚 珂

总 编 汪铁民
副 总 编 高 奇 徐 燕
本期执行主编 徐 燕
责 任 编 辑 朱燕红
美 术 编 辑 陈玉叶 宣胜艳

总 编 室 010-63098140
编 辑 部 010-83084071
010-63097425
010-83084429
010-83084312 (传真)
邮箱: zgrdzz@npc.gov.cn
事业发展部 010-83084070 (广告)
010-83083036 (发行)
010-63093787 (发行、传真)
邮箱: zgrdfx@npc.gov.cn (发行)
记者通联部 010-63097970
010-83084419 (传真)
办 公 室 010-63098354
010-63098540 (传真)
地 址 北京市西交民巷23号
邮 编 100805
国 际 刊 号 ISSN1671-542X
国 内 刊 号 CN11-3442/D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6.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0188号

目录 | Contents

01 卷首语

01 关注各阶层妇女的利益诉求

18 言 论

专 论 18 欧洲债务缘何频亮红灯
——谈欧债危机的形成、影响及应对



23 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的模式
第一篇: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演变和发展

08 报 道

本期策划 08 法律关怀下的妇女权益保障



12 撑起政治舞台上的半边天
14 妇女劳动权益保障还缺少什么
16 从制度层面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专题报道 28 抚州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

31 地 方

青 海 31 “用不了三五年, 玉树一定会更好”



6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时进行了专题询问。图为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回答委员的询问 摄影/马增科

重 庆 32 安居:代表没有遗忘农民
吉 林 34 渎职侵权犯罪:查办预防一个不少

看 世 界 48 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的立法
随 笔 52 杯中世界

36 人 物

代表风采 36 世博会:服装挑战未来智慧
——访上海长宁区人大代表、上海世博会职业
服装的“总设计师”刘晓刚
38 高代表“议”堵
代表建言 40 农产品信息发布体系要集中权威统一
寻 访 41 徐建春:新中国第一个知青明星
故 人 43 共和国“掌柜”的为国理财经

综 合

看点 04 动作 05 新语录 05
观 点 06 高考人数下降:背后原因发人深省
06 “分蛋糕”的中国难题
07 加大监督法律实施力度刻不容缓
07 预算不公开,人大“不同意”
各地动态 54

44 泛 读

往 事 44 我在人民大会堂的十年
史 话 46 应时而生的清末“立宪团体”



封面照片:图/CFP

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进行专题询问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24日上午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时进行了专题询问。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多位负责人到会回答询问。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进行专题询问。

今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题汇报,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答复问题。

根据有关法律規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监督工作安排,每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要审议国务院关于上一年度中央决算的报告。为了督促国务院有关方面加强和改进预决算管理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今年6月审议中央决算报告时就相关问题进行专题询问。

6月24日上午,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分为6组审议中央决算报告等。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肯定中央决算报告,对决算报告涉及的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专题询问。许多常委会组成人员就加强和改进预决算管

理工作、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均衡拨付预算资金、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提出了问题,财政部负责人一一认真作了回答。提问与回答有来有往,会议充满了民主、热烈的气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询问是人大监督的法定形式之一,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法定权利。在多年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实践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各项议案、报告提出询问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进行专题询问,是贯彻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增强监督工作实效的积极探索。与以往的询问相比,专题询问主题更加集中,有利于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督,推动有关方面改进工作。

到会回答询问的财政部负责人表示,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询问,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财政工作,更好地实现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宗旨。财政部将认真梳理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提高预决算管理工作水平,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周婷玉 邹声文)☑

吴邦国会见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6月1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访问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伊赫桑奥卢。

吴邦国说,中国 and 所有伊斯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双方交往历史悠久。中国历来珍视同伊斯兰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感谢伊斯兰国家长期以来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持,中国也同样在伊斯兰国家关切的问题上一贯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新形势下,中国愿进一步加强同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贸、人文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配合,促进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友

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吴邦国还应询介绍了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及加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

伊赫桑奥卢说,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友好交往,不仅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伊斯兰会议组织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伊斯兰世界愿同中国一道秉承友好传统,加强交流,挖掘合作潜力,共同开创双方关系的美好未来。(荣燕)☑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将有章可循

环境保护部日前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和卫生部四

部门联合印发了《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2008-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

环境保护部有关人士表示,这是我国第一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规划》以解决水质不达标及重污染水源地的环境问题为重点,明确了八项建设任务:在一级保护区实行隔离防护;实施一级保护区整治工程;实施二级保护区点源整治工程;实施二级保护区非点源污染防治工程;实施水源生态修复与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水源地监测体系,提高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监测能力和监督管理水平,提高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监测能力;建成覆盖全国的饮用水水源地信息管理系统,提升饮用水水源地信息管理能力,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提供支持;提高饮用水水源地预警能力和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编制城市水源地应急预案并实施演练,防止饮用水源污染,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

广东出台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

日前,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明确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并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政绩考核。这意味着,今后事关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省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决策等内容都将进行政治协商。而这也是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

据了解,该《规程》有五大亮点十分令人瞩目:明确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规定了政治协商的两种基本方式及协商形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统一了政治协商的五个程序;纳入政绩考核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了省委、省政府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系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邓新建)☑

国务院成立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近日,国务院成立了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政策协调。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研究制订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和实施意见,组织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做好专项治理工作的部署和相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组织开展工作检查,交流和通报情况,总结推广经验,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不属于新设立议事协调机构,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结束后即撤销。✘

公安机关将开展为期7个月的治安严打整治行动

6月13日上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机关“2010严打整治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强调,针对当前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公安部动员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为期7个月的严打整治行动。全国公安机关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深入开展严打整治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活动,从严加强社会面治安管控,坚决遏制各类突出犯罪,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努力为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民政部:进一步做好当前救灾应急各项工作

6月17日,民政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当前救灾应急各项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通知指出,目前抗灾救灾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各地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把抗灾救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始终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放在救灾工作的首要地位。✘



为困难群众张罗吃喝正是共产党的本分,怎么做也太过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传统节日端午节到来前夕召开的一次专题会上说,解放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有了大发展,“吃”对于富人来说早就不成问题了,但对困难群众来说,一年难得痛痛快快地吃几顿,咱可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衡量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是老百姓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在重庆调研时强调,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让群众在生态保护中得到实惠。

——云南省长秦光荣日前在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生态环境保护,一定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要把生态保护工作与区域内群众的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让群众在保护中得到实惠,真心实意地支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当代中国的法官,既要会讲法理,也要会讲道理,还要会讲情理。

——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在省法院机关青年干警座谈会上这样说道。



充分考虑社会对司法改革的理解力和承受力。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座谈会上说,各级人民法院要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充分考虑社会对司法改革的理解力和承受力,正确选择改革方式和时机,合理把握改革力度和节奏,为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确保公正高效廉洁司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体制机制保障。

高考人数下降： 背后原因发人深省

文/ 浅泽

本月上旬,全世界最大、最紧张的比赛,中国的高考刚刚结束。根据教育部的统计,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46万人,比去年减少74万人。整整74万,这已经是高考考生连续第二年出现大幅度下降。适龄人口的减少是考生人数大幅度降低的主要因素,然而除此之外,很多考生的主动放弃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上大学曾经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是改变多少人人生命运的途径,何忍轻言放弃?背后的原因值得整个社会深深思考和反省。

大学生就业难使高考热度降温。金融危机爆发后,多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愈加突出,高中毕业生通过上大学找个好工作的想法受到动摇。不久前北京团市委、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发布2010年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示,今年大学生本科学历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达到20%,与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接受零月薪时限最短为1个月,最长可达半年。“不要钱”,固然可以看出大学生个人趋于“灵活、现实”的就业理性,然而无奈的选择则缘于对就业困难的悲观预期。与此相抗衡的却是教育费用的节节攀升,城市普通工薪阶层供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动辄要花几十万元,许多家庭苦不堪言,更何况农村家庭。要不要让孩子参加高考?上大学究竟值不值得?如今它们已成为众多家庭再三权衡的经济命题。

对教育品质的不信任让更多的学生选择出国读大学。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出国人数增加了4.95万人,增长近三成。这其中有许多是高中阶段最优秀的学生。

近年来,教育机会与社会公平之间的裂痕凸显。受高等教育并不一定获得公正待遇,这对于渴望从教育中获得社会地位提升的那些处在底层的青年来说,高考的价值有所褪色。

如何让高考人数下降不变成坏事?一方面,营造更公平的发展环境,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力,这些是政府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生源危机给一些高校带来了生存危机,却也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更大的变革机会。假如生源危机,让高校不得不面向需求、面向社会办学,让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少一些束缚,多一些选择,让教育回归本位,不再被扭曲,则将是教育之幸也,民之幸也,国之幸也。✘

“分蛋糕”的中国难题

文/ 刘文学

桌上放着一个冰激凌蛋糕,小娟向小明提议如此这般分配。假如小明同意,他们就会按照契约分享这个蛋糕;小明若不同意,双方持续争执,蛋糕将完全融化。

这个被称为“分蛋糕问题”的经典博弈论模型似乎有着无穷的魅力,引来讨论的人无数。比如说,数学家探讨人数大于2时的分配方法,法学家在明确背景正义后主要对程序正义进行讨论……这些讨论无一例外地都遵循了一个前提条件:蛋糕分配要保证公平正义。

但也有例外。《经济观察报》报道: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树声率民盟中央调研组,赴广东就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展开专题调研。在广东阳江时,当地官员向调研组强调:“先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调研组立即表示:“不宜这样想,没有‘分好’的机制,越大越难分。”很明显,那位地方官员只是谈及了做蛋糕与分蛋糕关系的一个方面,与围绕博弈论经典模型的其

他讨论相比,他把公平正义的前提晾在了一边。

亚当·斯密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其实,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蛋糕的分配应当保持公平正义的前提已经是一个不辩自明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位官员撇开公平正义前提不谈的分蛋糕逻辑确实值得玩味。

在蛋糕很小的时候,蛋糕不够是分配中的最主要矛盾,强调做大蛋糕与分蛋糕的关系,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当蛋糕大到一定的程度,分配不均已经成为分蛋糕中的主要问题时,有人还抱着以前的思维不放,这很让人怀疑这种态度是“顾左右而言他”,这种态度的背后其实暗藏着一种利益的选择。

这种利益一般和不够公平的分配机制相联系,它们对公平正义缺乏一种必要的敬畏,并且阻扰着公平正义的实现。当然,这种特殊利益不会公开反对公平正义,它们经常戴着各种面纱出现。不适时宜地强调“先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抵制对不合理的旧分配机制进行改革,这只是它们献给我们的众多面纱中的一种。

特殊利益蒙着各种面纱暗地侵蚀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正义,这已经成为我们收入分配改革所必须破解的一个难题,也是“分蛋糕”这个经典问题和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相结合而衍生出的一个时代命题。

民盟中央调研组对强调“先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的地方官员表示:没有“分好”的机制,蛋糕越大越难分。他们的表态其实为解决这个时代命题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思路:收入分配改革一定要完整地坚守住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底线,要对分配机制进行整体完善。只有这样,才会不至于掉进各种“面

纱”背后的陷阱,让改革陷入细节的修补补,触及不到实质问题;才会不至于让改革平衡、协调各方利益的初衷异化成权力、资本自我膨胀的结果。✘

加大监督法律 实施力度刻不容缓

文/ 梁朱珠

6月4日,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该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全力推动在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等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这份通知特别强调,企业工会要大力推动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健全维权机制,加大维权力度,提高维权实效。

发出这份通知是十分及时的,内容也恰当当前劳动领域一些问题的要害。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的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相继发生了多起员工持续停工,甚至跳楼自杀的事件。尽管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是,劳动者的报酬和福利待遇水平长期不能“抬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在工人权益意识日益增强的当前,有尊严的劳动、体面的工作成为一种最基本的要求。这些事件警示政府有关部门,如果工人正当的利益诉求不能在制度内得到合理的回应,那么,他们就会以激烈的方式寻求制度外的途径以求实现。

这说明越是利益多元、博弈不断,越是要靠法律来定纷止争。应该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有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定来保护的。近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遗余力地加强社会领域立法,编织了一张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大“网”。在2009年中国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组织

了工会法执法检查,对工会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交有关部门解决。这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稳定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但从近期发生的这些事件来看,法律的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很多民众认为,加大监督法律实施力度刻不容缓。

长期以来,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促使“纸面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始终是无数法律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更是广大民众的期盼。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这方面的声音愈发响亮。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即将宣布形成之际,应更加关注法律的实施问题。特别是社会法部门,在劳资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对广大普通劳动者而言,其价值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

很多民众希望尽快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以促使法律更好地实施。✘

预算不公开, 人大“不同意”

文/ 致远

近日,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推出的《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指出,按照各省财政透明度满分1180分计算,各省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率仅为21.87%,省级财政透明度整体状况较差。同时以100分为满分计算的我国省级部门机关财政收支透明度平均成绩也只有3.21分,信息透明度情况整体滞后。

虽然调查者一再声称,这个调查还不是非常准确,得零分者并不意味着这个省的行政收支信息真的一点也不公开,只是表明这个省对课题组的信息公开申请完全不予理睬,但这样的数据还是让人感到有些“寒碜”。

为何各级政府就这么不愿意公开

财政预算呢?究其原因,无外乎财政收支信息全盘透明后,干了什么事、花多少钱是要暴露在每一个人眼前,自然公款出国、吃喝、福利等这一系列备受百姓诟病的“灰色地带”就会全部消失,使得一些部门支配资金的余地变得荡然无存。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有一些部门打着保密的官腔,来回应公众关于财政信息是无法透露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所谓的“保密”信息,早在2008年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十二条就明确指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公开财政预算、决算报告;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等都是完全可以公之于众的。但如今已经两年过去了,一些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报告依然被捂得严严实实,使得民众“一睹庐山之面目”的想法着实难上加难。

难道就真的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当然不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主任高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很多年前,中国的知识界就提出过实行国家预算公开的“梦想”,人大现在正在做的,是把这个“梦想”变为现实。

由此看来,要进一步推动预算公开,首先,需要从国家到地方各级人大的共同努力。因为,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大具有“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权力。此外,监督法也对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明确规定了七项重点审查内容。其次,人大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代表对于预算报告可以对政府“不打棍子,不掀辫子”。第三,人大积极开展预算审查,提高监督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才能切实保障人民在财政管理上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促进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法律关怀下的 妇女权益保障

文 / 本刊记者 张维炜



一国的妇女解放程度常常被视为社会进步的“天然标尺”和社会变迁的缩影。2010年,对于中国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显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节点”。今年是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5周年,也是实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落实2001—2010年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最后“冲刺”年。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了修订5年来的首次执

法检查。吴邦国委员长对此特别作出重要批示,称“这次执法检查,要特别关注各阶层妇女的不同利益诉求,推动解决一些制约妇女发展和权益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力求监督实效”。

6月2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在报告时表示,5年来,法律的贯彻落实实施情况较好,妇女事业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他同时指出,“要使男女从法律上的平等达到现实生活中的平等,仍然任重道远。”

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中国妇女解放发展历程,就像一部荡气回肠的史诗。女性群体的权益保障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如今的妇女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角色,并逐渐成为活跃在政治、经济舞台上的精英。

而在全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刘振华看来,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为妇女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据了解,早在1954年,新中国在制定第一部宪法时,就将男女平等的思想写入其中。1992年,为了落实宪法的规定,履行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的义务,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在中国妇女解放历程中,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谈到这部法律的出台,刘振华副主任委员向本刊记者表示,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保障妇女权益的基本法律。作为我国人权保护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妇女权益保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2005年十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新的形势和各方面意见,总结实践经验,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了修改、充实和完善。

“修改后的法律进一步突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权益保障的重点。”刘振华说,法律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并进一步明确了执法主体,强化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和法律责任,在妇女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人身和婚姻家庭权益保护等方面增加了新内容。

5年来,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妇女、保护妇女、男女平等的良好氛围,妇女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执法检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建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中央和部分省(区、市)建立了由政法委牵头,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民政、教育、劳动、妇联等有关单位成员的妇女维权工作协调组。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及妇女维权工作协调组的各成员单位积极建立维权服务机构,搭建服务妇女的维权平台。法院系统建立了“妇女维权合议庭”,检察机关设立了“妇女维权岗”,司法部门建立了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妇联系统健全了四级信访网络,开通法律服务热线,在城乡社区建立妇女维权服务站(点)等妇女维权保障机构和设施。

对此,李建国表示,“全国上下逐步形成了齐抓共管、共同推进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实施的工作格局。”

配合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各地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多方努力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女性所占比例稳中有升。与此同时,我国女性就业数量大幅增加,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维护工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是法律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刘振华直



摄影/海安 仇巍山

我国女性就业数量大幅提高,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全国在业人口中女性比例达到45.4%

言,比如,妇女参政的比例较之男性偏低,妇女就业和退休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女职工的劳动保护落实不到位,一些农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益、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等方面存在男女不平等的情况。

因此,及时总结经验,挖掘制约各阶层妇女发展和权益保障方面的深层次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和建议,推动问题的切实解决,更好地落实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国策,就成为开展此次执法检查“大布局”的应有之义。

覆盖31个省市的“大检查”

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是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一个重点。

虽然已事隔一段时间,但回想整个执法检查的过程,刘振华仍然很激动。在他看来,这次检查的规模可谓前所未有的。

据他介绍,2010年3月17日,执法检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妇联关于妇女权益保

障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和介绍。民政部、全国总工会提供了书面材料。中组部对这次执法检查给予了大力支持,也提供了相关情况的书面材料。

3月下旬至4月上旬,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分6个小组赴津、吉、鲁、徽、桂、陕6个省(区、市)进行检查,李建国、陈至立、司马义·铁力瓦尔地、严隽琪四位副委员长亲自率队分赴4个省(市)。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委托其他25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情况进行自查。

“执法检查覆盖了我国内地31个省(区、市)。”刘振华说,这充分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的高度重视。

4月下旬,检查工作渐入“收尾”。为了能对实际情况获得更加全面的了解,全国人大内司委在天津召开了有9个省(区、市)人大内司委负责同志参加的执法检查座谈会。

刘振华向记者表示,“这种监督形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中还是第一次。”“在会前,我们特地强调,要

各地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反映问题,特别是要反映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经验,绝不能回避突出问题。同时,要求大家深入分析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刘振华认为,通过交流、讨论、沟通,执法检查组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会后我们感觉,这次执法检查工作形式多样,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群体的妇女权益保障情况进行了较深入的检查,加大了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力度,是对执法检查工作的一次有益探索。”刘振华深有体会地说。

此外,妇女政治权利、劳动权益的保障情况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情况被确定为贯穿整个“大检查”的重点。

在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致认为,这次执法检查重点突出,准确地抓住了妇女权益中的关键性问题。

其实,即使是这些内容的确定也是颇费“周折”的,刘振华表示,全国人大内司委事先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据他介绍,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全国人大内司委就与全国妇联、农业部、全国总工会在工作层面进行了多次沟通,之后,又专程赶赴北京、山西、广东、河南、云南、甘肃6省(市)进行了执法检查前期调研。

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内司委又与全国妇联就执法检查重点进一步沟通。经过深入调研和多方交流,综合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单位的意见和建议,报经常委会领导同意,才最终确定了上述重点检查内容。

“这三个方面较好地反映了各阶层妇女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刘振华评价说,它们突出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中依法保障妇女合法权益这个核心问题,体现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根

本要求。

妇女维权工作仍任重道远

虽然从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新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但是全国人大内司工委青妇室主任高淑玲向记者坦言,“就现阶段,从法律平等到事实平等,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妇女权益保障事业总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谈及在这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一些突出问题,高淑玲感触颇深。她表示,这些问题有的是老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有的则是新出现的问题。妇女在劳动权益、财产权益和政治权利保障上仍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

以就业和劳动保障为例,执法检查组发现,就业促进法实施后,“显性”的性别就业歧视现象虽然有所减少,但是“隐性”歧视并不鲜见。女性求职难度仍然大于男性。部分中小企业侵害女职工劳动权益的现象屡禁不止。特别在近两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下,女职工更是成为部分企业首先裁减的对象。男女职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然存在。此外,城镇

职工生育保险推进缓慢,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和处级以上女干部的退休政策,在部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说到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问题,高淑玲表示,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但是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城乡结合部和征占地较多的地区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高淑玲说,比如,有的地方土地被征后少给或者不给妇女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有的地方还用村规民约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限制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这导致一些地方农村出嫁女的权益保障问题成为上访和司法诉讼的热点。”

在参政方面,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妇女仍然面临着参政比例总体偏低的局面。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所占比例长期徘徊在22%左右;在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女委员所占比例最高时也仅为17.7%。

对于上述问题,执法检查组建议,要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抓好对各级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业经营者的宣传教育,要把妇女权益保障法纳入普法规划,继续通过广泛深入宣

传,增强全体公民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意识。同时建议健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各项机制。

执法检查组还呼吁,要切实解决妇女权益保障中的突出问题,并就提高妇女参政比例、加强妇女劳动权益保护、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和有针对性的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结束之后,如何推动问题的实际解决和建议的真正落实显然最为人们所关注。对此,在采访的最后,刘振华向记者表示,按照监督法的规定,执法检查报告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及时汇总整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并将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函送国务院办公厅和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人大内司委随后还要对这些处理情况进行跟踪督查,督促有关部门在6个月内向常委会提出落实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情况的书面报告,并对书面报告进行研究,提出审议意见,印发常委会会议。

“开展一次执法检查很不容易,各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全国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黄镇东在审议时强调,通过这次执法检查,要实实在在地推动法律的贯彻实施,解决妇女权益保障问题,为女同胞实实在在地做些实事。

千千万万的妇女身上有着多重角色,她们是母亲、妻子、女儿,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她们的尊重和保护,小到关乎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大到涉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人类的文明进步。因此,“男女平等”宏伟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妇女自身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执法检查中发现,女性求职难度仍然大于男性

摄影/张

观念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不能一时彻底改变观念的情况下,当下妇女的政治权利主要还是依靠国家制定强有力的措施确保法律、法规落实到位来保障。

撑起政治舞台上的半边天

文 / 本刊记者 谢素芳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其中,妇女平等地享有参与国家事务以及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即政治权利平等,是实现男女平等不可或缺的内容。

“妇女的政治权利非常重要,如果妇女在政治上没有表达自己声音的机会,妇女的权益保障实际上是没有代言人的。”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妇联主席朱丽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政治权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通过选举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二、成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成员参与国家事务以及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三、村民进入村“两委”(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或当选为村民代表。

妇女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我国的选举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都对妇女的政治权利作了特别规定,比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培养、选拔和任用干部,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并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成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并且,十届全国人大在2007年还明确规定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比例不得

低于22%,以保障妇女在政治决策中的话语权。

今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执法检查,其中妇女的政治权利保障情况被列为三大检查重点之一,这一做法得到委员和代表的一致称赞。

另一方面,1990年以来,中央组织部先后6次召开会议,对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进行专门部署,明确提出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的目标要求和政策措施。

2008年,民政部和全国妇联还联合下发了《关于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妇女参加村民委员会工作的意见》,对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代表的比例作出规定。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不断改善妇女参政的社会环境,提高妇女参政水平。”全国人大常委会李建国副委员长说。



2010年1月29日,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与政策推动项目启动会在京举行。图为陈至立副委员长(左)为邓楠颁发聘书

据了解,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所占比例比十届全国人大提高了1.2个百分点,十一届全国政协女委员所占比例比十届全国政协提高了0.9个百分点;2008年省、地、县三级政府领导班子中女领导干部配备率分别为93.5%、90.0%、90.3%,比2005年分别提高了6.4、7.4和6.5个百分点。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录的公务员中,女性所占比例由1999年的31.5%逐年上升到2009年的42.5%,有的地方新录用公务员中女性人数甚至超过了男性;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所占比例为21.7%,比2005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

“现在的女性接受过教育的越来越多,整体知识水平有很大提高,她们参

政议政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参政议政的意愿和能力都具备。”朱丽萍代表对记者说。

保障政策要“硬”

相比过去,参政议政的妇女人数虽有明显提高,但与男性对比,其参政比例却一直偏低,跟理想有差距。“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所占比例一直在22%以下,截至2008年,全国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中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10.5%、13.2%和16.8%。2008年换届后仍有相当数量的村委会中没有女性成员。”李建国副委员长在报告中透露。“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在立法机构和决策位置当中,女性应该占30%,我国目前女性参政比例与此相比差距还很大。”陈秀容委员说。

“妇女参政人数和比例与女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她们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还不相适应。”李建国副委员长也在报告中表示。

参与了执法检查的朱丽萍代表告诉记者:“我以前也在一线工作,其实候选人中女性比例很多都达到了22%,但选完后就达不到了,什么问题?”她认为,法律、法规得不到落实,在于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有关法律对妇女参政的规定多是原则性的规范,强制力不够,难以有效保障妇女的参政权利。“如果没有达到规定的人数,就是不合法,是不是得重选?”她建议加强制度的保障力度。

此外,委员和代表们都发现,在各级各部门都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女领导干部“虚职多,实职少;副职多,正职少;教科文卫等部门的多,经济金融部门的少”,农村的“两委”中女性任正职的比例更低,只有1%—2%。“有的部门对女干部的培养选拔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对女干部的成长形成一定制约。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力度不够,措施还不够完善。”执法检查组报告中如是写道。

对此,张柏林委员表示,“要避免出现‘三多三少’现象,一是需转变观念,另一个是要采取相关政策,从开始就让女同志多挑重担。”

“男尊女卑、重男轻女这一承传了几千年的封建落后思想,仍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之中。妇女参政比例偏低等问题,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没有真正深入人心的具体反映。”全国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黄镇东说。

朱丽萍代表也认为传统思想中对妇女的偏见是影响女性参政的根本原因,“我过去在一些单位做过领导,对此很有感受,甚至连一些女领导都有这种观念。”她告诉记者,“男主外女主内”是农耕时代以体力为依据的社会分工,现在是信息时代、科技时代,是靠智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而女性与男性绝不存在智力上的差异,在参政议政方面要求男女完全平等一点也不为过。

再者,我国的退休政策规定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委员和代表们都认为这一政策影响了妇女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过去女性提前退休是对女性的爱护和保护,那时体力活相对较多,现在不同了。”朱丽萍代表建议放开妇女退休年龄的限制,与男性一样60岁退休。

农村妇女的政治权利

农村妇女的政治权利是委员和代表们关注的另一焦点。我国农村幅员辽阔,农村妇女数量众多,尤其是在农村大量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中有60%—70%是妇女。

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村委会组织法中都明确规定,“村委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定,积极为妇女参选、当选创造有利条件。可以说,村委会成员中女性当选率有了明显提高。但农村妇女进“两委”的比例仍很低,比如,2008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后,陕西省全省有49%的村

委会中没有一名女委员;安徽省有三分之一的村委会没有女委员,女主任的比例只占6.9%。

“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只占21.7%,这个比例较低,底座不大,上面的比例怎么能大?”朱丽萍代表建议正在修订的村委会组织法把“村委会成员中,应当至少有1名妇女”写入法律,保障农村妇女的比例。

陈秀容委员也认为,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发展,农村妇女的社会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普遍提高,和广大村民一样,农村妇女群众不仅关注集体利益,而且关注政治权益、精神文化生活以及社会发展问题。“我们做的调查显示,96.7%的妇女关心村里的公共事务。”

农村妇女不仅具有享受政治权利的意识 and 意愿,而且也具备一定的能力和需求。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菁对记者说:“现代农村妇女多数有知识、有文化,完全可以成为村民代表,完全可以进村委会。况且,现在留在农村的大部分人都是女同志,她们的利益必须有女代表来为她们说话。”

然而相比城市,农村性别观念更严重,农村妇女进入“两委”或选为村民代表更难。对此,委员和代表们纷纷建议,可以吸取各地成功经验,采取“定位选举”、“预留职位”、“妇女委员专职专选”等方式,推动农村妇女参加村民自治。

保障妇女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尚需要加强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国策的宣传,改变社会的性别观念,提高人们对妇女参政议政的认识。然而“观念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不能一时彻底改变观念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政策的引导和保障”。朱丽萍代表认为,当下妇女的政治权利主要还是依靠国家制定强有力的措施确保法律、法规落实到位来保障。★

现实中妇女就业方面的不公平待遇依然存在。进城务工妇女劳动权益问题突出,妇女社会保险的参保率整体低于男性。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女性比男性面临更严峻的就业挑战。要使男女从法律上的平等达到现实生活中的平等,仍然任重道远。

妇女劳动权益保障还缺少什么

文 / 本刊记者 王 萍

青岛妇联等部门发起“和谐社会,关爱孕妇”活动,制作了5000枚“孕妇徽章”,并开始向岛城准妈妈们发放,以提醒广大市民对怀孕妇女给予关照和帮助。图为一名孕妇在展示刚领取的“孕妇徽章”

回 溯 / 经 济



当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在中华大地吹响女性解放号角的时候,中国妇女逐渐走出家庭、融入社会,追求并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保障妇女平等的劳动权益便成为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事实上,随着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中国妇女在参与经济建设过程中拥有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经济收入,妇女劳动权益的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2005年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写入总则。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实生活中妇女在就业方面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现象依然存在。“要切实解决妇女权益保障中的突出问题,加强对妇女劳动权益的保护。”6月23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在作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时强调。

成效显著背后的努力

“高校有责任和义务配合政府和社会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一个文科院校,女大学生比较多,本科生和研究生中的女生比例都超过了50%。中国政法大学科技园向全国妇联提出创建‘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的申请是为女大学生的就业提供一种

选择、开拓一个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告诉本报记者。

据张保生介绍,法大科技园作为加强大学生实践教育方面的一个有益尝试,正在为文科类毕业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实践作出努力。具体表现在开展就业和创业政策咨询、搭建与企业的沟通渠道和平台、进行创业辅导、开辟创业场所等方面,充分利用科技园的资源扶持女大学生创业实践。

就在不久前,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产学研基地,2007年成立的中国政法大学科技园经全国妇联批准,成为第三批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之一。据了解,共有340家单位获批成为第三批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

“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的发展

是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各级教育部门、妇联组织等联合组织的“女大学生创业导师行动”推动下实现的。该行动计划在2009年到2012年间建立5000个女大学生实践基地,目的是为高校女大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服务。

这些还只是国家为保障妇女劳动权益所付出各方面努力的冰山一角。李建国在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中指出,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和妇联组织及社会各有关方面,在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强化组织建设、完善政策法规、采取多种措施等多方面着力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除了促进女大学生的就业工作,还对自主创业的女性提供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予以扶持,破解妇女创业就业的资金瓶颈,极大地促进了城乡妇女的创业就业工作。

时至今日,我国女性就业数量大幅提高,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在工程建设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据数据显示,全国在业人口中女性比例达到45.4%。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只有60万女职工,现在,我国有女职工8168.7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6.3%;女农民工达2786.2万人,占女职工总数的34.1%;在农村,60%以上的劳动力是妇女,许多妇女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致富带头人。

更多关注妇女就业质量

6月24日下午,在分组审议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的各个会场,不时传来笑声和掌声。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将更多理性的关爱投向了中国的妇女,并就妇女劳动权益表达了这样的共识——在飞速发展的中国,妇女的社会角色与分工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和转型,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成为拥有职场精英、妻子、妈妈等多重身份的现代女性。同时

委员们也指出,当前妇女与男性面对的劳动机会还不均等,妇女面临的性别歧视、生育保险推进缓慢、劳动保护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现在女大学生就业数字不低,但就业质量不高。女大学生在接受工作岗位时相比男大学生比较迁就。女大学生在面试的时候,往往会被问到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等难堪的问题。”曾担任过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吴启迪委员强调应看到隐性性别歧视问题。

“我在学校工作,看到女大学生就业非常艰难。举个例子,今年我们毕业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不太优秀的男博士生或硕士生找到了工作,比那些优秀的女大学生找到工作要容易得多。隐性性别歧视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郑粉莉建议,应对政府、事业单位等部门录取女性的数量规定一个比例。

对妇女劳动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应采取切实措施。陈至立副委员长、汪纪戎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朱丽萍均指出,人口生产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事,应加快推进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并用税费减免等政策来改变女职工多的企业负担重的问题。

黄镇东委员建议,应尽快修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这个规定自1988年颁布到现在已二十多年。其中一些条款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女职工劳动保护的需要。”他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应抓紧修改,特别是对女职工的禁忌岗位要加以明确,以加强对女职工的劳动保护。

化解退休政策的现实困境

“现在我们学校正面临退休政策难题。学校的女性正教授55岁就被要求退休,校方与市人事部门交涉,人事部门要求学校打继续留职报告,报告打上去后要等研究再定,现在仍没有结果。55岁的女教授正是家庭负担少、工作

经验丰富的人才,反而要退下去,退下去后待遇就不一样了。而且学历越高、上学时间越长的女性,工作时间多达不到35年,享受不到应有的退休待遇,这也是不合理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孙菁说。

审议中,很多委员都谈到了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处级以上女干部和女职工的退休政策问题。郑功成委员对退休年龄的规范方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要早动手,二要明确目标,三是只能小步渐进、平稳过渡。国家应当尽早确定男女同龄退休的目标及实施方案,如到2020年时实现男女公职人员同龄退休,则可以在10年间每年延长女性退休年龄半岁。这样既可达到目标,又不会产生太大波动,是积极稳妥的解决方案。同时还应允许弹性退休,不要太强调“一刀切”,这样才有可能推进。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广西执法检查时发现,一个地市级就有两个政策。为什么连地市级都不能执行统一的政策,不能说它错,因为相关文件规定是‘可以’,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不刚性。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女高级知识分子和处级以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问题上认真地把政策明确下来,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黄镇东委员建议。

妇女劳动权益的保障问题并不仅仅是法律问题,除了法律的完善,还和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恰如李建国在执法检查报告中指出,新中国已成立六十多年,妇女权益保障法已经颁布实施十八年,但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残余仍然存在,应切实加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惟有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整个社会舆论所认同和倡导,并在国家制度政策中充分体现,中国妇女才能在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岗位时,在劳动权益上收获更多更好的理解和保障。✘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从深层次看,它不只是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也不只是执法不严的问题,而是涉及土地承包政策的问题。现行土地承包政策是按户来承包的,没有男女区分,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改革开放初期,这对打破‘大锅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导致一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

从制度层面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文 / 本刊记者 李小健



李一凡/摄影

通过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发现,在实际情况下,农村妇女享受合法的土地权益仍存在困难

伴随新中国60年的锐意进取,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各方面权益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和保障,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情。

然而,事不尽美。在我国农村,许多地区的妇女土地权益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侵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价值的大幅增加,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以及财产权益保护难度却越来越大。进一步保障她们的权益,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做出更多努力。

今年3月至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其范围覆

盖我国内地31个省(区、市)。通过检查,深入推动了法律贯彻实施,从制度层面切实保障了妇女合法权益。

在执法检查中,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情况被定为检查的三个重点之一,主要包括农村妇女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征用补偿费用等方面权益的保障情况。

“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6月23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李建国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简称执法检查报告)时指出,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和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加强管理化解纠纷,保障了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

但是通过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发现,在实际情况下,农村妇女享受合法的土地权益仍存在困难。张美兰委员认为,现在农村妇女嫁出去后,按照法律规定有权利享受土地,但是实际上很难再分到土地。正如执法检查报告

所说,“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受侵害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来自陕西省合阳县的全国人大代表、甘井镇同堤坊村党支部书记刘会莲是最基层的代表,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她向本刊记者坦言,农民靠土地生活,没有土地就无法生活。1995年土地政策调整以后至今没有再变动,农村妇女分不到地、没有地的情况在很多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她家乡合阳县也不例外。

“常常是,有的一家四口种两个人的地,有的一家四口却种六个人的地,甚至七个人的地。很多没有分到地的妇女,一家几口都在靠种地维持基本生活。地少,生活自然好不起来,她们平等分到地的意愿非常强烈。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刘会莲将此问题直接归咎于“去世的老人霸占了集体土地、吃了国家财政”。

全国人大内司委委员戴玉忠对本刊记者说,依照法律、法规,男女应平等享受合法的土地权益,但实际上存在偏差。一些地方以村委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的名义作决定,对于出嫁女不给或者少给土地补偿费。他举例说,北京市大兴区某村以村民代表大会名义决定,对于出嫁女,尽管她的户口、住房、承包田都在村里,但是只能得到40%的土地补偿

费,这明显有失公平。

就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遭到侵害的情形,执法检查报告作了具体阐述:有的地方在发包时少分承包地给妇女;有的地方妇女出嫁或者离婚、丧偶即被收回承包地;有的地方土地被征后少给或者不给妇女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有的地方用村规民约或者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等形式限制甚至剥夺妇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

多方面原因所致

对于造成上述情形存在的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认为是多方面的。

其一,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村民中有不少人认为出嫁、离婚的妇女没有理由享有土地及经济利益。

其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不明确。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有的地方以户口是否在本村为标准,有的以是否有承包地为标准,有的则以是否实际居住为标准。“标准不一样,相应的待遇也就不同,有的享受成员待遇,有的打折,有的完全没有,这是引发农村妇女特别是‘农嫁女’(主要是农村出嫁、离婚、丧偶的妇女,俗称‘农嫁女’,也包括未婚且未离开农村的大龄女青年和入赘女婿等群体)土地承包权益纠纷的重要原因。”

其三,法律、政策执行不到位。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如果严格依法办事,应该可以保证“农嫁女”在其中一处享有土地承包权,但实际生活中“农嫁女”土地承包权两头都不落实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其四,对村民自治缺乏有效的监督。现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应当对



如果严格依法办事,应该可以保证“农嫁女”在其中一处享有土地承包权

摄影/董钟德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对违法的予以撤销,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村规民约大于法”的现象。基层干部反映,在一些农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侵害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问题比较明显。

其五,救济措施缺位或难以执行。一些行政部门未依法履行监督指导职能,对侵害“农嫁女”权益行为的处理不到位。一些基层法院以村民自治、执行难为由,对这类案件设置限制条件或者不予受理。

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前提和关键

在诸多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因素中,执法检查报告指出,“由于各地土地承包情况比较复杂,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要有一个过程,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是集体经济权益分配的争议焦点,也是解决纠纷、维护农村妇女,特别是‘农嫁女’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条件和关键。”

李建国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在执法检查报告中表示,首先,农业部等部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问题应加大研究的力度,并加强工作指导,妥善解决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不明晰而引发的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问题。其次,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进行备案审查和纠错工作。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修改村委会组织法,建议在该法中增加相应条款。再次,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加

强对涉及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统一审判尺度,解决相关案件受理难、执行难的问题。最后,各级农业、民政等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和工作指导,及时发现并解决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问题,切实维护农村妇女的财产权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问题,非常现实,直接关系到‘农嫁女’能否平等地享受土地权益。”黄镇东委员表示,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不清晰,造成了不少地方“农嫁女”权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同时,正在审议修订的村委会组织法,应增加条款纠正与法律、法规不符合的村规民约,“有了这样的机制,‘农嫁女’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

戴玉忠委员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对农村土地的征用补偿问题加大工作力度,发现问题。政府部门要积极开展工作,依法予以解决。对于没有得到合法补偿或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妇女,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的起诉。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从深层次看,它不只是男女不平等问题,也不只是执法不严的问题,而是涉及土地承包政策的问题。”陈斯喜委员分析说,现行土地承包政策是按户来承包的,没有男女区分,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改革开放初期,这对打破“大锅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导致一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

陈斯喜委员认为,在农村土地坚持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更好地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需要从土地的承包政策上来研究,并予以解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光靠强调地方严格执法不是很好的办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刘会莲代表则建议,对“农嫁女”进行补地;对吃了国家财政的包括教师、已分配的大学生、父母双亡的进行减地。在坚持国家大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要“大稳定、小调整”。✱

欧洲债务缘何频亮红灯

——谈欧债危机的形成、影响及应对

文 / 尹中卿



2010年5月10日，欧洲中央银行宣布，为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将买入欧元区政府和私人债券，但买入规模待定

近半年来全球经济最为关注的热点，莫过于欧盟部分国家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继迪拜债务延期偿付、冰岛宣布破产之后，希腊债务危机率先拱出，随后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也相继亮起红灯，被外界戏称为“猪”（PIIGS）。目前，欧盟五国主权债务危机事实上已经演变成成为欧元区第二次危机，不仅阻碍欧盟经济复苏，甚至可能动摇欧元根基，对欧洲一体化前景造成严重威胁。欧债危机是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实质上也是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在后金融危机阶段缓慢复苏进程中，欧债危机蔓延使得世界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担忧。如果应对不好，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再次探底。我们要密切跟踪欧债危机的最新进展，及时采取应对

措施，防范欧债危机殃及我国。

形 成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世界各国普遍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金融机构救助和失业救济等支出大幅增加，

财政收入却由于经济下滑而锐减，导致许多国家财政赤字飘红，债台高筑，危机负担从民间转移到公共预算身上，银行和企业债务转变为国家主权债务。根据欧盟统计局今年4月22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与2007年相比，欧盟27国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从0.8%升至6.8%，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从58.8%升至73.6%；欧元区16国赤字率从0.6%升至6.3%，负债率从66%升至78.7%。2009年年底，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赤字率分别达14.3%、13.6%、11.2%、9.4%、5.3%，负债率则达到64%、115.1%、53.2%、76.8%、115.8%。各国赤字率、负债率均远远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3%和60%的上限。目前，欧盟五国政府债务高达25万多亿欧元，占五国GDP的90%以上。欧洲央行持有爱尔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债务的比例分别为85%、89%、89%、90%、96%。

表1 2006—2009年欧盟、欧元区财政赤字及负债水平 单位：百万欧元

地区	年份	GDP	财政赤字/盈余	赤字率（%）	公共债务	负债率（%）
欧盟27国	2006	11682471.0	-167687.0	-1.4	7172706.0	61.4
	2007	12364567.0	-103584.0	-0.8	7265256.0	58.8
	2008	12500094.0	-285685.0	-2.3	7697027.0	61.6
	2009	11804734.0	-801866.0	-6.8	8690304.0	73.6
欧元区16国	2006	8553600.0	-112048.0	-1.3	5842888.0	68.3
	2007	9003902.0	-55723.0	-0.6	5940433.0	66.0
	2008	9258895.0	-181176.0	-2.0	6424615.0	69.4
	2009	8977933.0	-565111.0	-6.3	7062625.0	78.7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由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引发的主权债务问题在欧洲并不陌生。徘徊在欧盟之外的冰岛原本是以捕鱼为生的蕞尔小国,近些年来,随着银行证券保险业发展,冰岛银行吸纳了大量海内外资金,还购置了大量海外资产,最终导致债务急速膨胀。2007年,冰岛GDP仅为193亿美元,但是外债规模却相当于GDP的12倍,仅3家银行所欠外债就高达1380多亿美元,摊到每名冰岛人身上达37万美元之巨。2008年第四季度,国际金融危机“海啸”席卷冰岛,货币市场融资活动停滞,外汇资源很快枯竭,银行债务升级为主权债务,国家信用评级被连续下调,这个人均GDP在世界排行第四的北欧国家瞬间坠入地狱。

欧债危机最先在希腊引爆。希腊作为高福利国家,通过增加税收、紧缩开支解决债务问题面临很大阻力,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压力较大。2009年10月,希腊财政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分别达到12.7%和113%。2009年12月,赤字率上升到13.6%,比2006年的3.6%提高10个百分点;负债率上升到115.1%,比2006年的97.8%提高17.3个百分点。包括标准普尔、惠誉、穆迪等3家主要评级机构先后宣布下调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目前,希腊赤字率超过14%,负债率更高,政府债务中外债占70%以上,外债总额高达2980亿美元,官方外汇储备只有1.6亿美元,仅仅占短期债务的2%,偿债压力巨大。今年希腊政府必须筹集约540亿欧元才能满足融资需要,而其10年期国债利率比德国同期限债券高300个基点,融资难度明显增加,主权信用违约掉期(CDS)价格显著上升,4月上旬一度摸高至850个基点附近,截止到6月7日依然维持在770个基点的高位。4月27日,标准普尔把希腊评级下调至BB+。6月14日,穆迪将希腊主权债券信用评级下调4个级别,从A3直接降至Ba1。希腊主权债券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前

些天,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表示,除非立即采取财政紧缩措施,否则,希腊将面临国家破产的风险。

然而,欧债危机并没有在希腊止步。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

也相继亮起红灯。由于主权债务激增,每年还本付息的财务成本显著上升,加深了投资者对主权债务信用的担忧。从2006年到2009年,爱尔兰的赤字率从盈余3%变为14.3%,债务率从

表2 2006—2009年欧盟五国 (PIIGS)财政赤字及负债水平 单位:百万欧元

国家	年份	GDP	财政赤字/ 盈余	赤字率 (%)	公共债务	负债率 (%)
葡萄牙	2006	155446.0	-6092.0	-3.9	100522.0	64.7
	2007	163052.0	-4218.0	-2.6	103702.0	63.6
	2008	166463.0	-4705.0	-2.8	110377.0	66.3
	2009	163891.0	-15426.0	-9.4	125910.0	76.8
爱尔兰	2006	176759.0	5221.0	3.0	44059.0	24.9
	2007	189751.0	261.0	0.1	47410.0	25.0
	2008	181816.0	-13198.0	-7.3	79859.0	43.9
	2009	163543.0	-23350.0	-14.3	104667.0	64.0
意大利	2006	1485377.0	-49403.0	-3.3	1582081.0	106.5
	2007	1546177.0	-23191.0	-1.5	1599755.0	103.5
	2008	1567851.0	-42575.0	-2.7	1663452.0	106.1
	2009	1520870.0	-80800.0	-5.3	1760765.0	115.8
希腊	2006	210459.0	-7496.0	-3.6	205738.0	97.8
	2007	226437.0	-11478.0	-5.1	216731.0	95.7
	2008	239141.0	-18303.0	-7.7	237252.0	99.2
	2009	237494.0	-32342.0	-13.6	273407.0	115.1
西班牙	2006	984284.0	19847.0	2.0	389507.0	39.6
	2007	1052730.0	20066.0	1.9	380660.0	36.2
	2008	1088502.0	-44260.0	-4.1	432233.0	39.7
	2009	1051151.0	-117630.0	-11.2	559650.0	53.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图1 2006—2009年
欧盟五国 (PIIGS)赤字率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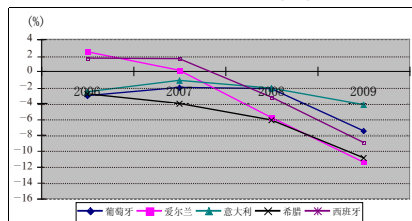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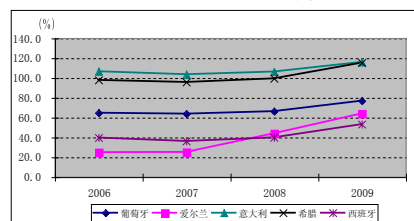


图2 2006—2009年
欧盟五国 (PIIGS)负债率变化



24.9%升至64%;西班牙的赤字率从盈余2%变为11.2%,债务率从39.6%升至53.2%;葡萄牙的赤字率从3.9%变为9.4%,债务率从64.7%升至76.8%;意大利的赤字率从3.3%变为5.3%,债务率从106.5%升至115.8%。2009年以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陆续下调了这些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西班牙、爱尔兰、

葡萄牙、意大利的主权信用被从最高的AAA级分别下调至AA+、AA、A+、A+。4月28日,标准普尔又把西班牙评级从AA+下调至AA。此外,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国的财政问题也因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而受到市场的密切关注,国际评级机构同时下调了这些国家的主权评级。

令人担忧的是,欧盟五国主权债务危机并不是孤立事件,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水平和债务规模也很突出。目前,英国的赤字率为11.5%,比2006年的2.7%提高近9个百分点,创20年来新高,在7国集团中位居榜首;政府负债规模几乎是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四国的总和,负债率高达68.1%,比2006年的43.5%提高近25个百分点。据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统计,2009年法国的财政赤字为1448亿欧元,赤字率为7.5%,预计今年将再创历史记录,赤字率可能高达8.2%;公共债务为14890亿欧元,负债率77.6%,比2006年的63.7%提高近14个百分点,预计今年负债率可能增至83.2%。日本情况更糟,2009年日本债务总额已达创纪录的871.5万

亿日元,负债率高达189.3%,赤字率接近10%。有人预言今年日本债务累计总额超过950万亿日元,负债率可能超过200%,赤字率超过10%。6月11日,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在国会首次演讲时警告,日本目前债台高筑,已经是发达国家中负债最高的国家,而财政持续恶化的日本将可能陷入希腊式危机。美国债务规模及赤字状况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奥巴马总统今年2月提出的预算草案预计,2009财年赤字为1.75万亿美元,占GDP的12.3%,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目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达13万亿美元,接近GDP的100%。如果奥巴马不能兑现今年将赤字水平降至8%的承诺,美元也有可能重蹈欧元的覆辙。

影 响

欧债危机影响十分广泛,不仅影响欧盟各国,而且也影响全球经济,对我国也有很大影响。

从欧洲来看,欧债危机延缓了欧盟各国经济复苏进程。尽管欧盟五国在欧盟内部经济份额不大,但高额债务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据欧洲央行5月31日公布的《金融稳定报告》显示,两年来因金融危机已冲销银行坏账2380亿欧元,欧债危机爆发后,握有大量欧元区国债的银行今年又损失900多亿欧元,明年可能达到1050亿欧元。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半年来欧元汇率已累计下跌10%以上。如果欧盟各国财政状况不能得到实质性改善,欧元地位必然进一步恶化,最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欧盟统计局6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欧元区失业率达10.1%,创下1998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为救助欧盟五国,欧盟不仅提出巨额援助计划,各国还纷纷缩小经济刺激力度,欧盟各国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挑战。

从全球来看,欧债危机拖累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随着欧洲主权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振荡,世界范围内股市大幅下挫,欧元汇率不断下跌,部分国家国债风险溢价持续走高,私人投资意愿陡然下降,信用风险开始从民间企业向主权国家转移。欧债危机严重冲击了经济复苏信心,引发市场恐慌情绪,缩小了扩张性刺激政策的运用空间,增加了各国政府退出时机、规模和方式的选择难度,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如果欧盟央行提高贷款条件,欧元区一些国家银行系统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风险,而继续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资金,则可能加剧通货膨胀预期。在欧债危机冲击下,欧美两个经济体都可能出现通缩。美国4月份的CPI已经进入了通缩,欧洲接下来要进一步紧缩财政,其内需也将因此而急剧萎缩。如果美、日、英等国家主权债务也发生危机,

表3 2006—2009年英法德三国财政赤字及负债水平 单位:百万欧元

国家	年份	GDP	财政赤字/盈余	赤字率(%)	公共债务	负债率(%)
英国*	2006	1325795.0	-35748.0	-2.7	577123.0	43.5
	2007	1398882.0	-38721.0	-2.8	624626.0	44.7
	2008	1448392.0	-71416.0	-4.9	753625.0	52.0
	2009	1395872.0	-160258.0	-11.5	950359.0	68.1
法国	2006	1806433.0	-41066.0	-2.3	1149937.0	63.7
	2007	1895284.0	-51433.0	-2.7	1208950.0	63.8
	2008	1948511.0	-64677.0	-3.3	1315147.0	67.5
	2009	1919316.0	-144849.0	-7.5	1489025.0	77.6
德国	2006	2325100.0	-37800.0	-1.6	1571673.0	67.6
	2007	2428200.0	4880.0	0.2	1578833.0	65.0
	2008	2495800.0	990.0	0.0	1646163.0	66.0
	2009	2407200.0	-79410.0	-3.3	1762211.0	73.2

注*:英国相关数据单位为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今年5月10日,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一项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援助机制,其中,4400亿欧元由欧盟国家根据相互间协议提供,600亿欧元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2500亿欧元。这项援助机制虽然部分减缓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担忧,但很多人对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真能解决好债务危机依然心存疑虑。6月17日,欧盟又召开峰

会商讨对策。由于主权债务危机事关欧盟核心利益,相信欧盟将会竭力协调解决部分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对于美、英、日等国来说,虽然各自的赤字和债务也很高,由于没有类似“马约”的硬性财政约束,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这些国家应对债务问题的政策选择也比较多。因此,欧债危机失控、欧盟以外国家直接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2010年5月9日,欧盟举行财长特别会议,讨论捍卫欧元稳定、增强市场信心的具体实施方案。图为意大利财政部长特莱蒙蒂(左)、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经济和财政大臣萨尔加多(中)、希腊财政部长帕帕康斯坦季努在会议举行前交谈

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动荡加剧。

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中资机构持有欧盟五国国债和资产不多,即便欧盟五国最终陷入债务违约,对我国的直接影响也很有限。但也必须看到,欧盟作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元区内需和流动性一旦收紧,势必对我国出口造成冲击,宏观经济政策退出也将面临挑战。其具体影响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

1. 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在欧债危机冲击下,欧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下跌,美元对欧元、英镑、瑞郎等货币纷纷升值,本月上旬,欧元对美元汇率为1.25,与欧元正式启动后的最高点1.59相比贬值28%。从2009年12月至今,欧元对美元汇率下跌20.4%。6月7日,欧元对美元汇率创下1.19的4年来新低。欧元走弱必然导致人民币伴随美元升值。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对欧元和欧盟其他货币出现较大幅度

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升值15.9%,对英镑升值10.7%。仅最近1个月,人民币对欧元升值7.6%,对英镑升值3.1%,对其他欧系货币也明显升值。

2. 影响我国对欧盟出口。欧债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口复苏前景更不明朗。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欧洲各国争相致力于扩大出口、减少进口。据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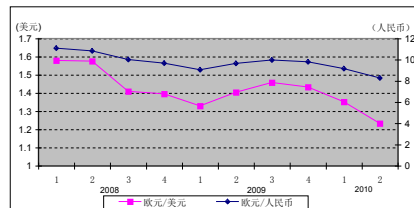
2009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3641亿美元,占我国全球外贸总额的16.5%。其中,我国对欧出口2362.8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9.7%。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我国欧盟市场出口的价格竞争力明显下降。如果出口企业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如果欧盟五国等贸易逆差国融资出现困难,这些国家就不可能再通过资本净回流弥补经常项目亏空。有人估计,欧债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在下半年会越来越明显。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我国的出口将会增加,我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继续下滑。

3. 加大境外热钱流入压力。目前,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物流、资金流及人员往来频繁,国际收支年交易量超过4.5万亿美元,超过同期GDP规模。在经济高度开放的条件下,热钱流动在所难免。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美元低利率、低汇率,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有升

值预期,导致跨境套利交易泛滥,美元投机资本大量流入。随着欧债危机的影响持续加深,以及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升值,我国很可能成为更多国际投机资本的避风港。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的热钱不仅会推高我国资产价格,而且也会增大跨境资金监管的难度,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4. 增加我国外汇储备缩水风险。由于美国具有储备货币发行权,加之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重要角色,其偿债能力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偿债,对我国影响很大。尽管目前还不清楚欧元、英镑等欧系资产在我国外汇资产中所占比例有多高,但欧系货币贬值,将使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资产缩水 and 购买力下降。美国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下,很可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的隐性方式来降低外债偿还义务,这将导致美元流动性泛滥,严重影响我国外汇储备保值增值。

图3 2008—2010年
欧元/美元、欧元/人民币季度汇率走势



应 对

从全球范围看,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不可避免。我们要密切跟踪欧盟各国,特别是欧盟五国的经济运行情况、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府债务、财政赤字等指标,加强主权信用和偿债能力评估,适时调整应对政策策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可能的负面影响。同时,还要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支持欧元货币稳定,支持欧盟各国克服债务危机。

第一,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近两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对后金融危

机阶段欧债危机的新情况,我们要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实现外汇储备安全、流动、保值增值。

一要完善国际储备结构。逐步增加商品储备的比例,加大对贵金属和石油等战略性物资的储备力度,防范和控制投资风险,确保投资安全。

二要拓展外汇运用渠道。通过对外投资多元化,逐步降低债权投资比重,适当增加优质股权投资,保持外汇储备充分的流动性。

三要防范外汇资产缩水。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支持中投公司联合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开展海外资源和实业投资。不仅关注投资收益,同时也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提高投资回报,更好地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目标。

第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2005年6月到2009年2月,通过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27.1%。从2009年2月到2009年11月,由于实行人民币紧盯美元政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9.4%。欧债危机以来,欧元疲软导致人民币伴随美元升值,短期内人民币对美元已缺乏显著

的趋势性升值空间,近期我国出口强劲增长势头也为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提供了机会。我们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充分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启动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一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积极培育汇率避险市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为人民币最终走向完全自由浮动和国际化奠定基础。

二要恢复人民币汇率弹性。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实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有利于帮助出口商摆脱贸易萎缩困境。面对欧债危机冲击,迫切需要改变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政策,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三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适应欧元大幅贬值的新情况,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汇率水平,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四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国际多边金融合作,大力开展区域性货币互换,支持亚洲外汇储备库建设,加快培育亚洲债券市场,增强区域流动性互助能力,逐步摆脱国际储备货币过分依赖发达国家的被动局面。

第三,加强对短期投机资本监管。由于我国实行资本管制,“热钱”流入需要借助正常的贸易投资渠道以及其他隐蔽方式迂回流动,在流入渠道、套利过程等方面与资本自由流动国家有明显不同。要从根本上解决“热钱”流动风险,必须理顺国内资源、资金等价格体系。在欧债危机中异常跨境资金流入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强外贸、外资、税收、海

关、外汇等部门政策协调,加强对“热钱”流动的监测和监管。

一要强化外汇管理。不仅要关注美元资产流入,也要关注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强化对贸易、个人、外商投资等外汇管理。

二要加强跨境热钱流动监测。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协调行动,加强对跨境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防范热钱大规模流动给国内金融体系造成大的冲击。

三要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外贸、外资、税收、海关、外汇等部门政策协调,加大对非法外汇资金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假冒出口骗退税、虚假外资和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现有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规模没有必要再增加了。从长远看,防范外汇储备风险,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从近期来看,要切实改变“宽进严出”政策,控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以减轻外汇储备管理的压力,降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的风险。

一要减少流动性储备的规模。加大“藏汇于民”政策的实施力度,适度放松外汇流出管制,鼓励企业和居民购买、持有外汇,允许境内机构将出口所获外汇留存境外,促进贸易便利化,提高境内机构外汇资金使用效率。

二要扩展企业外汇投资渠道。继续完善境内企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更好地满足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的购汇用汇需求,促进企业境外投资便利化,抓住欧元疲软的契机,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到欧洲投资。

三要完善资本项目管理。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有控制地开放资本账户。鼓励国外金融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鼓励国内商业银行发放外汇贷款。✶

(作者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迷失的欧元



编者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险体系中建立时间最早、涉及基金数额最大的一个主要险种，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也在不断地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模式发生了几次重大的改革，至今依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当前，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加快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是目前以及“十二五”期间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项重点工作。最近，乌日图同志通过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演变和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要求的研究提出了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政策建议。本期起将陆续刊发，以期得到深入探讨。

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的模式

第一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演变和发展

文 / 乌日图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完善,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包括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三项基本制度,其中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间最长,目前已经覆盖约2.1亿人。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虽然都处在试点阶段,但也已经分别覆盖了2500万和4700多万人,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本文主要研究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模式变化。为了突出研究重点,本文按照制度模式的主要特点,把60年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历程划分为“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以下简称“社会统筹”)、“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以下简称“统账结合”)、“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分立”(以下简称“统账分立”)三个阶段。以下在分别介绍三个阶段制度实施的主要情况的基础上,研究制度模式的演变和发展。

社会统筹阶段 (建国初期至1991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高度统

一的计划经济,在产品生产、流通、分配的各个环节实施政府统一调配,国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体制下,为了保障职工在疾病、负伤、残废、死亡、生育、退休时获得必要的治疗费用、抚恤费、补助费、退休生活费等,我国效仿原苏联的“国家保险”模式,建立了劳动保险制度。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保障项目包括职工的退休、疾病、工伤、生育等,劳动保险待遇的支付标准根据职工的最低保障需要与国家可能的财力制定。

《条例》规定,劳动保险的各项费用,全部由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缴纳,职工不缴纳任何费用。劳动保险金的支付一部分由企业直接负责,主要是职工及家属的医药费和病伤假期工资的支出等;另一部分由企业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3%拨交工会组织,其中30%上缴全国总工会形成劳动保险总基金,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筹举办集体劳动保险事业,其余的70%由基层工会组织管理,形成劳动保险基金,用于支付职工的劳动保险费用。劳动保险基金每月结算一次,余额全部转入省市工会组织

或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作为劳动保险调剂金,用于基层工会组织收不抵支时的补助或举办集体劳动保险事业,中华全国总工会对此有统筹调用的权力。省市工会组织或产业工会的劳动保险调剂金不足时,可以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申请调拨调剂金。可见,这一阶段的养老保险是以省市、全国两级基金统筹调剂的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制度。制度模式的主要特点:一是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即以满当期的退休费用收支平衡为原则,按照所需支付的退休养老金总额进行社会筹资的基金筹资模式;二是社会统筹,即从企业收缴的退休养老费用由劳动保险经办机构实行全额或部分的统筹调剂使用;三是退休养老金的待遇标准由政府统一规定,和缴费人单位的缴费多少无关。退休养老金的替代率不高,一般为35%至60%。这一制度对于建国初期迅速恢复生产,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调动职工劳动积极性起到了很大作用。据有关资料记载,1952年参加劳动保险制度的职工约1500万人,主要集中在产业工人较多的东北和上海等地的国营企业,社会统筹基金主要用于这些地方,到1983年参保人数达到8600万人。

遗憾的是,“文化大

革命”开始后,刚刚建立不久的劳动保险制度遭到彻底的破坏。1969年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要求国营企业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原在劳动保险金开支的劳保费用,改在营业外列支,劳动保险制度完全成为企业内部的一种财务安排。改革开放后,这种由企业自行解决职工退休费的政策在运行中弊端明显,除了造成企业因退休人员多寡



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第九社区职工边恒权退休后开始全心地投入到风筝制作中,成了小区里闻名的“风筝制作行家”

不同带来退休费用负担的畸轻畸重,不利于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正确考核和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还会因为影响在职职工的工资和生活福利待遇,继而影响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鉴于此,上世纪80年代初政府开始在各地积极试点退休人员养老费用的社会统筹。从1986年起,在全国县市一级实行养



敬老院里,老人们正在进行扳手腕比赛

老保险社会统筹,到1991年年底,全国绝大多数县市开始实行辖区范围内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地区积极向省级统筹推进。这个时期的制度建设主要还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由企业保障向社会统筹转变的恢复性改革。另外,1986年我国开始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并建立了劳动合同制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按照规定,劳动合同制职工要按本人标准工资的3%缴纳养老保险费,改变了过去养老保险费完全由企业缴纳的做法,在我国社会保险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制度。

统账结合阶段(1991年至2000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要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把社会保障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五大支柱之一。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社

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养老保险筹资方面,确立了养老保险费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负担”的原则,标志着社会养老保险开始了制度模式方面的改革探索。《决定》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支付的实际需要,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统一筹集。职工缴纳本人工资的3%并入统筹基金。从1992年开始,劳动部门按照“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原则开始进行养老保险金计发办法的改革。此外,《决定》还提出了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以及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要求,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93年以后,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改革的讨论更加活跃,特别是受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和对福利国家制度批判的影响,同时受到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和智利养老金改革

的启发,国内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提出了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要从“现收现付”向“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过渡的改革思路,具体实现途径就是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这一改革思路得到中央的肯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

提出,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现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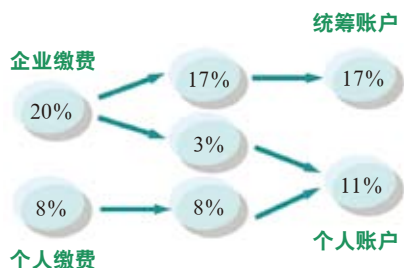
根据《决定》精神,199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具体化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由于当时对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如何结合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提供了两个实施方案由各地选择。这两个方案,根据统账结合比例的不同,一个称为“大账户小统筹”模式,强调个人账户的作用;另一个称为“大统筹小账户”模式,强调社会统筹的作用。有的地方在实践中采取了介于二者中间的中账户方案,也有的地方采取了其他方案,因而造成各地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措施的千差万别,社会上和政府有关方面关于制度模式的争论更加激烈。

为改变养老保险制度多种方案并存的局面,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各地统一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统一的内容包括:1.各地统一按职工工资11%的数额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其中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从本人缴费工资的4%逐步提高到8%,并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见图1)。2.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



总投资1200多万元的安徽省肥西县紫蓬山敬老院已投入使用,当地153名五保老人正式入住

图1：统账结合阶段的目标缴费标准



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企业缴费除划入个人账户之外的部分划入社会统筹账户。3. 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按照当时的制度设计和测算，职工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为当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本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20（根据生命表测算的退休职工平均剩余寿命月数）。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支付给本人。

制度虽然统一了，但从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制度过渡到现收现付加部分积累的统账结合制度遇到的最大问题没有解决，即制度中“老人”和“中人”的历史欠账，因而造成既要保障当期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又要为现在在职的参保人积累个人账户，但缴费标准是按现收现付的制度模式以满足当期养老金的发放制定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将个人账户基金的一部分或全部用于当前养老金的发放，导致个人账户处于长期“空账”运行的状态。

统账分立阶段（2000 年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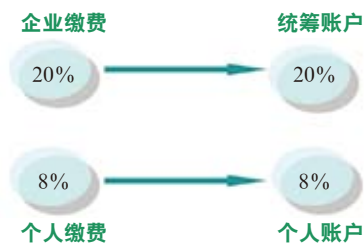
为了解决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长期“空账”运行，确保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2000 年年末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并选择了辽宁省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按照试点方案，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实行分账管理，社会统



2010 年2 月1 日，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岭头村95 岁的郑纯柱老人（右）高兴地领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银行卡

筹基金不能占用个人账户基金，也就是个人账户基金不得用于支付当期养老金发放，即所谓的“做实账户”。试点方案规定，企业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纳入社会统筹基金，统筹调剂使用。个人账户规模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纳（见图2）。

图2：统账并行阶段的目标缴费标准



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缴费满15 年的，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为30%左右，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根据本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20。辽宁试点在中央财政的巨额资金支持下，实现了做实账户的基本目标。2000 年以后，吉林、黑龙江作为第二批试点省份开展了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但做实账户的比例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当地

的财力和中央财政专项补贴的力度。

2005 年国务院在总结东三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发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做实个人账户，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要求。

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三个发展阶段的比较

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国经济社会制度的反映。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历史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时间不长，是和新中国的建设同步发展的，因而既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特色，也深受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影响（见表1）。

在社会统筹阶段，社会保险制度是和计划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其理论基础就是原苏联的国家保险理论以及西方的福利经济学，也由于当时国家经济落后，财力不足，劳动者的生活保障从供给制到低工资加低福利，劳动保险作为一项福利制度由国家统一提供，因而更加注重强调互济、公平。虽然当时参加劳动保险的人数并不多，基金积累也不多，但社会统筹的作用非常明显，而且

从一开始就实行了全国统筹调剂的社会保险制度。应该说,在这一时期,作为社会保险基本功能的统筹互济作用发挥得非常好。

在统账结合阶段,社会保险制度的重新建立主要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提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一方面受到国企改革指导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影响,因而作为再分配功能的社会保险也和初次分配一样被强调要体现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所以在借鉴国外,特别是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的基础上,设计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引入个人缴费也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个人缴费主要是强调个人要为社会养老做贡献,由于代际转移制度也可以理解是为自己的养老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所以个人缴费纳入统筹基金参与统筹互济,并不和自己将来的养老待遇挂钩;第二阶段是建立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划入个人账户,再加上单位缴费划入的一部分作为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个人缴费在一定程度上与自己的养老金待遇



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敬老院的老人们兴奋地进行体育比赛

挂钩,体现了多缴多得。

在统账分立阶段,制度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统筹制度和个人账户制度已经不再像前两个阶段有相互结合的成分,而是分道扬镳,成为两个分立的制度,或者说是两个独立的制度体系。表现在两个基金从收缴、记账到养老金发放上都互不相关。二是个人账户制度已经不再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成为一个强制性

的个人专项储蓄计划,因为它已经失去了社会保险最基本的互济功能。另外,在国家承担基本保障责任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基本养老金的一部分即个人账户养老金是完全由个人来承担的,至少从制度安排上来看,这是个人承担了一部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见表2)。✘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表1: 三阶段制度比较

发展阶段	时代背景	理论基础	保障模式	公平效率	保障水平
社会统筹	计划经济	国家保险、福利经济学	现收现付	强调互济、公平	基本保障
统账结合	配合国有企业改革	新自由主义	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险	引入个人缴费参与统筹互济制度	基本保障
统账分立	建立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	新自由主义	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险加个人养老储蓄计划	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基本保障

表2: 个人缴费及个人账户作用比较

发展阶段	个人缴费及个人账户	作用分析
社会统筹	0%至2% (上世纪80年代有部分地区试行个人缴费)	保险费全部由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负担,工人职员不缴纳任何费用。强调个人要为自己的养老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但并不和本人的养老金待遇挂钩。试点地区的个人缴费,是作为统筹基金的一部分参与统筹互济。
统账结合	11% (1995年开始建立个人账户,1997年统一比例为11%,其中个人缴费由4%逐步提高到8%,企业缴费由7%逐步降低至3%)	建立个人账户,将个人账户作为养老金计发办法的一部分,个人缴费一定程度上与养老金待遇挂钩。
统账分立	8% (2005年政策规定,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	作为个人承担基本保险责任的一部分,是一个强制性的个人养老储蓄计划。



江西省抚州市劳动保障局劳动监察人员给抚州美丽华大酒店员工发放拖欠工资

抚州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

文 / 本刊记者 李小健

农民工,这支从农村走出来的队伍接近2.3亿人,在改革的浪潮中,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发展的主力军。

当前,我国还有1.2亿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正陆续转向城镇。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就业形势极不乐观的城镇,如何接纳他们并保障其权益?

就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转移农村劳动力、保障农民工权益工作情况的报告。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指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从建立城乡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从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扩大参保覆盖面,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及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同时,逐渐放开农民工落户的限制,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在实际工作中,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保障农民工权益?我们不妨看看农业大市江西抚州的具体做法。

抚州,位于江西省东部。在中国版图内,它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市。

3月10日,本刊记者从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抚州市人口总数达到390万,其中,农业人口234.3万,占总人口数量比重逾60%。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速,农业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农村出现了大批富余劳动力。抚州作为农业大市,农村劳动力亦相当富余。全国人大代表、抚州市市长张勇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抚州市坚持实施赶超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发展,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视为发展区域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工程大力推进。

“同时,我们还下了不少功夫,制定专门的政策和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工权益不受侵害。”这位有着丰富劳动与保障方面的政府工作经历,曾出任江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厅长的张勇向本刊记者表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主体。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截止到2009年年底,抚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7万余人,占需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的91%。而据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抚州市城镇人口达155.76万人,比2000年增加64.25万人,城镇化水平上升至39.9%,比2000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增幅位居江西省第一。

多措并举转移农村劳动力

“解决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问题,首先是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发挥政府的引导功能。”张勇向本刊记者表示,抚州市辖区县乡村已实现就业服务“触角”全覆盖,市县建立劳动力市场,乡镇设立劳动保障所,村里设置劳动保障协管员。村里设置的劳动保障协管员负责村劳动力

情况的登记造册,记录村里劳动力外出打工、培训需求等就业信息,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

张勇说,由于许多农村劳动力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针对需求,抚州市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令他们有一技之长。2009年,抚州市投入培训费用逾3000万元,近5万人接受了培训,“对农村贫困户、复原转业军人及享受低保的家庭的子女采取特别措施,他们上技工学校全免费,还发放一定生活补助。”

抚州市崇仁县就业部门根据工业园区企业需要大量服装缝纫人员的实际情况,筹备100台电动缝纫设备全部安排到全县15个乡镇,对各乡镇的未能升学的初中生和社会青年进行技能培训,培训班办到了“农民家门口”。宜黄县在每一个行业选择1至2个龙头企业作为农民工培训基地,落实培训补贴政策,为企业培训员工1200余人。2009年,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金蓝领工程)37825人,培训后就业率达100%。

劳务输出是抚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抚州市积极加强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联系,开展劳务协作,目前已在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建立劳务输出基地20余个。近几年来,全市平均每年劳务输出人数60多万人,每年还呈递增趋势。2008年,全市劳务输出人数62万人,2009年达70万余人。劳务经济的产业化较快推进,已成为抚州市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本刊记者从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抚州市主要通过采取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统筹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等多项措施加以推进。

**“46条太多,说不清,
农民工也不好懂”**

“同时,把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

创业摆在突出位置,成为承接产业转移、推进赶超发展的重要方式。”张勇表示。

2009年,抚州市以市委1号和2号文件分别出台了《关于切实做好农民工返乡创业进一步推进全民创业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险工作的意见》,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宜黄县黄陂镇返乡农民杨学文,原在温州等地打工,返乡后,在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通过政策扶持,在丰厚工业园区开办了“雪狼”鞋业,吸纳农民工80余人。崇仁县航埠镇返乡农民工黄贵文从事麻鸡饲养、水面养殖项目进行自主创业,通过小额贷款扶持,走上了创业之路。

据悉,2009年抚州市18.3万名返乡农民工中有17.9万人实现了就业创业,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98%,抚州市为返乡农民工发放小额贷款4795万元,直接帮助了1218名返乡农民工实现了自主创业,带动就业5034人。

今年,抚州市政府又以1号文件《抚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扶持全民创业的意见》出台了12条含金量很高的扶持创业政策。“这是我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同志一起起草的,原来有46条,经过修改形成12条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张勇向本刊记者回忆说,“46条太多,说不清,农民工也不好懂,针对创业者创业过程遇到的实际困难制定一些专门政策,一个困难就是一个结,一个政策解开一个结。”

张勇表示,支持返乡创业,政府放宽小额贷款的限额,并实施贴息等优惠政策。同时,抚州市建立创业园,主要扶持农民工创业,解决有创业愿望、创业能力、创业项目,而没有场地的农民工企业。

今年1月至4月,抚州市直接扶持农村劳动力创业586人,发放小额贷款2860万元,带动就业3500余人。

“随着抚州市城镇化加速推进,最终农村劳动力到外省务工将呈减缓趋



抚州市劳动保障局劳动监察人员为江西宏大纺织有限公司员工发放拖欠工资

势,而到本省市就近就业是一个加速趋势。”张勇表示,政府一方面引导农村劳动力“走出去”,另一方面争取将他们“留下来”。近几年来,抚州市坚持实施赶超发展战略,不断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鼓励自主创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仅2008、2009两年,就有3.6万余人转移到抚州市工业园区就业。

另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抚州市落实各项政策,包括缓缴社会保险基金,降低减免四项社会保险费,并对困难企业提供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等,有效地减轻了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确保企业正常生产,有力地稳定了就业岗位。

尝试工作创新,保障农民工权益

2008年年底,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曾到抚州市南城、南丰、广昌三县,就切实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工作进行调研。苏荣在调研中表示,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伟大产物,是推进改革开放和江西崛起的重要力量,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是农民群众的优秀代表,是新时期的新农民,农民工已经和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尤其是返乡农民工的权益?社保关系转移无疑是农民工最为关心的。

“转移农村劳动力,最重要的是完

善社会保障制度,让全国农民工社保关系转移都能顺畅衔接。”张勇向本刊记者介绍,抚州市正在做一些新的尝试。比如说,抚州的农民工将社保关系从上海转移过来,只要到抚州市保障部门申请登记,就可以先转移社保账户上个人自交的一部分,而企业账户缴纳的费用,则由政府部门出面,与上海市劳动保障部门协商完成转移。

“现行医疗保险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大病医疗救助四个方面,我们正在研究一揽子计划,大力整合。”张勇说,抚州市政府医疗保险四方面全部整合在一块,统一由一个部门管理。由此,参加新农合保险的农民工转移到城市就业和居住,就可以与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等衔接起来。

张勇认为,在户籍方面,抚州市向在城镇中有固定住所、固定工作的农民工放开限制,就城镇郊区不愿意放弃土地的农民工,一方面鼓励其取得城市户籍,另一方面,让他们保留土地经营权。还要让农民工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这些包括教育公平、医疗公平、社保公平等等,让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中不会受到歧视。

积极应对难题

据全国人大农委调研报告显示,虽然近年来,农民工工作推进力度较大,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工群体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主体,农民工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增强,农民工就业和维权方面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采访中,抚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并不讳言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难题。

这些难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了对劳动者职业技能的要求,而抚州市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较低,技能单

一,缺乏相应专业知识和技能,部分企业“招工难”和相当数量农民工“就业难”并存的结构矛盾突出。

其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从事服务业的政策措施有待进一步加强和落实,公共就业服务基础仍然薄弱,仍需逐步加大投入。基层服务平台、信息网络建设仍然落后,还不适应农民工就业工作的需要。

其三,农民工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转移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由于流动性较大,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或难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保护;拖欠工资或要不到工资、工作中发生工伤事故得不到及时医治和赔偿等现象还时有发生。

抚州市所遇到的难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解决这些难题,抚州市一直在努力,并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应办法。如增加农民工培训投入,大力推行“招工、培训、就业”的三位一体的培训模式;加大公共就业服务基础投入,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指导、就业培训、职业介绍等一站式就业服务;积极扶持有条件、有能力的农民工创业,同时,降低小额贷款门槛;完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强化工资支付监控,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妥善处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

2003年以来,抚州市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规范用人单位用工行为。2008年下半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抚州市劳动监察部门共深入检查用人单位0.8万户次,查处各类农民工侵权案件798起,共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2172万元,为12.5万人次农民工维护了合法权益,责令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8.5万份次。

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抚州市有效防止了拖欠农民工工资、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侵害农民工权益的案件集中爆发,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农民工就业工作。✱

“用不了三五年，玉树一定会更好”

文 / 毛翠香 刘 娟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福海（中）、刘晓（右）慰问地震中罹难的玉树州人大机关干部公保才仁的母亲

玉树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的心。5月20日至21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福海、刘晓、昂毛等赴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各级人大代表及玉树州、玉树县人大机关干部职工，表达了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对他们的关爱，并带去慰问金，以及灾区干部职工急需的高压锅、保温瓶、羽绒被、挂面等生活用品。

马福海副主任握着全国人大代表、玉树藏族自治州州长王玉虎的手说，大灾面前有大爱，各级人大代表在抗震救灾中舍小家、顾大家，表现出了人民代

表为人民的精神风尚，值得我们学习。

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尕深有感触地说，这场大地震如果发生在旧社会，那肯定是一部分人被压死、一部分人被饿死、还有一部分人会病死，后果真的不堪想象。如今，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下，我们灾区群众有吃、有穿、有住、有医、有学上，各方面都有了保障，灾区社会秩序井然，这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支持！

玉树地震当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赶到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常委会各位副主任和机关的同志

们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与玉树的同志取得联系，了解地震灾情。4月15日，刘晓副主任主持召开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安排部署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支援灾区工作，并提出具体要求。同时，常委会机关捐款10万元，机关200多名干部职工和离退休老同志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通过捐款、缴纳特殊党费等方式，向玉树灾区捐款达25万元。常委会办公厅紧急购买价值7万元的方便面、火腿肠、饮用水等连夜送往灾区。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常委会党组号召，135名同志踊跃报名组成了玉树抗震救灾志愿者服务队，并前往西宁市火车站东货场组织装卸由西宁转运玉树灾区的救灾物资。这次，又从机关办公经费中筹措了30万元慰问金，购买了灾区同志急需的生活用品，向玉树州、玉树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每一位干部职工表示一份心意，表达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对玉树地震灾区各级人大代表、人大机关干部职工和群众的亲切慰问和深切关怀。

马福海副主任说，当前，玉树抗震救灾工作已经从紧急救灾状态全面转入以安置群众、恢复秩序、灾后重建为主要任务的新阶段，省人大常委会将一如既往地高度关注玉树抗震救灾工作，始终做到与灾区人民心连心、肩并肩，为灾区重建、为玉树人民的幸福生活，尽好我们的责任。

“国家帮一把，全国人民救助一把，老百姓自己努力一把，用不了三五年，玉树一定会更好。”受灾村民扎索的一席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安居：代表没有遗忘农民

文 / 王君宏 张双山 曾晓海



贫困户喜迁新居

4月19日，重庆市铜梁县福果镇三元村，春意盎然，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6社村民、58岁的李炳安笑得合不拢嘴。当天，他搬进了由人大代表捐资帮他修建的新房，多年的新房梦终于圆了。

“如果没有人大代表、政府的关心、援助、修建，我这辈子估计都难以住进这样好的新房子。非常感谢他们！”坐在两室一厅，自带厨房卫生间的农民新居里，面对记者，李炳安热泪盈眶。

和李炳安有一样心情的农民，在铜梁县农村还有很多很多：平滩镇珠玉村19社的孔凡模、土桥镇庆林村4社的彭弟春……记者实在是难以一一列举。

为全县困难农民解决住房问题，是代表们多年来一直关注、呼吁的事情。今年，铜梁县政府把为500户困难农民修建新房列入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发起“五个重庆建设，人大代表在行动”（以下简

称“代表行动”）主题活动中，一直关注困难村民住房问题的铜梁县人大和县人大代表们为了困难农民有房住，住舒心，过上幸福快乐的好日子，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或调研、视察、询问、评议，或捐资、慰问、帮扶，或亲自到建设现场和村民一起出工出力……

破题：盯紧“宜居重庆” 建设薄弱环节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改善民生，住有所居。当前，一谈到住房保障的话题，大多数人都会自然地想到城市困难人群。其实，作为社会公平、城乡统筹的目标追求，农村困难户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群体。

铜梁县自2001年以来，先后修建了7期廉租房，较好地解决了城区“双困”群众的住房难题。但在农村，仍有部

分特困群众房屋破旧，四面通风，难以遮风避雨。

如何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住房安全问题，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建设“宜居重庆”的一个薄弱环节。

重庆市铜梁县的人大代表们心系农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每年的人代会上都会有相关议案、建议提及困难农民的住房问题。特别是在重庆市提出“五个重庆”建设后，“宜居重庆”更成为代表们关注的一个重心。

2009年下半年，铜梁县人大常委会专门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就农村困难群众住房进行了一次调研，看到破陋不堪的住房，代表们流泪了：“真的没想到还有这么困难的农民，房顶大洞小眼的，外面下雨，屋内成溪。四面穿堂，门都没有一个的危房大有所在。”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县人大常委会向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提出了解决农村特困群众住房难的相关建议。

11月，县人大常委会又组织开展了《重庆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执法检查。期间，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县政府应把解决农村特困群众的住房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全面推进“宜居铜梁”建设。

2010年年初，县政府在向县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征询2010年为民办实事的意见时，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大代表再次提出了解决农村特困群众的住房问题的建议。在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大代表的推动下，铜梁县委、县政府将“实施困难群众安居工程，帮助500户农村低保特困户实施房屋改造”作为

2010 年为民办 10 件实事之一。

询问：要把好事办实、办好

“你们的规划、设计图纸做到什么程度了？”

“建设资金是如何筹集的？”

“为保障资金使用合理、安全，你们政府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

“安居房，农民能否得到这些住房的产权？”

……

一个又一个尖锐的问题被人大代表们提出，政府及其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一一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释、答复。

2010 年 2 月初，在铜梁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期间，少云、高楼、维新代表团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向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提出“关于落实农村困难群众房屋改造工作的询问案”。

在当天的询问现场，县长、分管副县长以及城乡建设、民政等部门负责人到代表团，就农村困难群众房屋改造工程规划、选址、建设进度、建设质量、资金筹集、对象选择等问题一一回答了代表们的询问，并听取代表们对这项惠民工程的意见和建议。

在代表们的关注下，通过困难群众自愿申请，在相关部门和乡镇、街道摸底调查、资格审查、资格公示的基础上，全县确定了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群众 474 户实施安居工程建设。同时，县政府及时出台了《困难群众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每户建筑面积约 63 平方米，每户补助 2.4 万元，建设资金由县政府财政安排和社会捐助。

为了保证安居房的质量，县政府对安居房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由县

城乡建委统一提供施工图纸，乡镇、街道负责组织施工和协调土地、办理相关房产手续；新建房内墙扶灰刷白，外墙墙砖勾缝，屋顶盖铁红瓦或青瓦，安装好门窗；选址在人口集中、交通便捷的地方；对建设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县里还把这项工作纳入对各乡镇、街道和相关

行动：推进农村困难群众住有所居

在县政府关于《困难群众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出台后，县人大常委会随即作出决定，结合“五个铜梁建设，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充分发挥代表的引领带动作用，帮助 100 户农村低保特困群众实施房屋修建。

号召一发出，全县各级人大代表就积极投入、参与其中。在 2010 年 2 月 2 日召开的“代表行动”动员会上，重庆市人大代表王宗立、铜梁县人大代表叶松茂等当即表态，为农村困难群众安居房建设各捐款 20 万元，参与和支持政府实施这项民心工程。

在人大代表的引领带动下，社会各界积极投身农村安居工程的建设，纷纷慷慨解囊，筹措到善款 507 万元，其中人大代表捐款就达 126 万元，为铜梁县顺利实施农村困难群众安居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各乡镇人大也纷纷开展

行动，或组织代表专题视察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或组织代表参与建房具体工作。

蒲吕镇人大在镇人代会期间，组织代表捐款 2.7 万元，帮助该镇 29 户房屋改造的贫困群众每户购买一台彩色电视机，改善其生活居住条件。平滩镇人大利用平滩籍成功人士新春座谈会的契机，为低保特困户房屋改造筹得善款 12.5 万元，基本满足了该镇安居工程建设费用。目前，部分人大代表还纷纷表示愿意为困难群众提供后续捐款，房屋建好后为其购买家电、家具等生产、生活用品。

目前，全县农村困难群众特困户房屋改造工程已开工建设 412 户，其中基础完成的 376 户，主体完成一半的 245 户，主体完成的 204 户，屋面完成的 172 户，门窗完成的 183 户。人大代表具体救助的 100 户中则已完成 52 户。预计在今年 6 月底，全县农村困难群众安居房建设任务将全面完成。

如今，当你走进铜梁县农村，看到的是一套套崭新的房屋耸立在公路两旁或田间地头。而当你走进其间，受助群众则无不动情地说：“人大代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是人民群众真正的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我们基本没花钱就住上了新房，还是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



人大代表帮助孔凡模新建的安居房



孔凡模以前居住的老房

渎职侵权犯罪： 查办预防一个不少

文 / 陈立忠



施台/摄影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向人民监督员征求反渎职侵权工作意见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渎职犯罪，以及刑讯逼供、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不仅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及威信。正因为如此，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十分关注全省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情况。5月28日上午，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的决议》，这必将把省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

专题调研：
吉林检察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吉林检察工作讲大局、思路清、效果好，走在了全国前列。”2009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赴吉林省视察反渎职侵权工作时肯定道。为进一步推动全省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的开展，省人大常委会组成调查组，对全省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调查中了解到200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各类渎职侵权案件1826件2299人，其中查处县处级以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05人，内有厅级干部5人。全省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连续多年在高检院综合考评中名列前茅，2008年名列第二名，2009年上升为第一名。2008年，省

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作为唯一的省级院的反渎职侵权局被高检院评为“全国十佳反渎职侵权局”，2009年，省院反渎职侵权局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可以说，通过办案，有力地惩处了渎职侵权犯罪，促进了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调查中发现，省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也存在一些问题。客观上，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认知度不高，案件线索发现难，办案取证难、处理难。据省检察院统计，2005年以来，全省由群众举报的渎职侵权犯罪线索仅占查处案件的23%。二是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机制

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据省检察院统计,2005年以来有关单位向检察机关移送涉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09件,仅占受理案件总数的10%。三是存在认识不一致的问题,案件处理难。有时造成一些案件“立不起来,诉不出去,判不下来”,影响了惩治和警示的效果。

在主观上,检察机关的工作还存在着不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检察院和检察干部对反渎职侵权工作存在畏难情绪,工作力度不够大;宣传发动群众举报犯罪线索、加强案件线索管理、增强办案合力等方面相关机制应进一步完善;一些检察人员业务素质 and 侦查水平还有待提高;个别检察人员执法不规范不文明的情况仍然存在。

会议审议:

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不能满足

5月26日下午,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审议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金锁在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中,组成人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有的委员说,加大查处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力度非常重要,渎职侵权犯罪对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损害很大,影响公信力,同时造成很大损失。如果不严肃

处理,社会危害太大,加大工作力度很有必要。要把典型案件办好,公开,在社会上造成影响力,扩大公信力;省检察机关取得的成绩与检察机关人员队伍素质的提高分不开,但有些问题仍然值得注意,要进一步加大对新生力量的培训力度,加大执行过程中的约束力度。

还有的委员建议在几个重点方面加大惩治力度:一是侵犯企业合法经营方面,其直接涉及吉林省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关系到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尤为需要重视;二是要加大查处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尊严等权利的案件,这类案件和百姓息息相关,影响力很大;三是在重大生产、社会事件中的渎职犯罪造成严重危害的案件,要加大惩处力度,不要仅停留在行政处罚的层面。

作出决议:

加强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本次常委会会议特作如下决议。

一是要充分认识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和惩治的必要性、紧迫性,必须进一步加强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

二是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必须依法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一步加大查

办渎职侵权犯罪的工作力度。适时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强队伍专业化和司法规范化建设,强化业务培训,严肃司法



2009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9204件24514人

纪律,深化检务公开,主动接受监督,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

三是全省各级行政机关要加强与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认真落实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的工作制度,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平台,对于渎职侵权犯罪线索要依法及时移送检察机关,对办案案件涉及的专门问题及时准确地做出鉴定结论,支持检察机关依法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各级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在加强与检察机关互相制约的同时,要积极支持检察机关开展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解决好办案中遇到的案件管辖、证据标准、刑罚适用和执行等方面的问题,确保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依法、及时、有效惩处。

四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认真执行《吉林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进一步加强渎职侵权犯罪的预防工作。

五是全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的监督和支持,有计划地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适时组织相关的执法检查、工作视察、专项调研,监督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认真解决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中的经费保障和技术装备等方面的困难,不断改善检察机关的司法条件。☑



2010年5月28日,最高检首次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记者、学生和社区群众代表参观。图为来宾在“12309举报电话”室参观

世博会：服装挑战未来智慧

——访上海长宁区人大代表、上海世博会职业服装的“总设计师”刘晓刚

文/顾青



刘晓刚教授（中）率领的上海东华大学团队在为世博会设计服装

自5月1日上海世博会开园以来，风格迥异的各国场馆、精彩纷呈的异国风情让人流连忘返。同时，醒目、好看的世博会各类职业服装，更是一道“流动的美丽风景”，给参观者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就连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看后也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这是世博历史上最好看的职业服！”而它的“总设计师”便是全国十佳服装设计师、上海市长宁区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刘晓刚教授。

“竞标的关键时刻我亮出了 人大代表的身份”

上海世博会仅志愿者就达8万人，还有参观者服务人员、保安、司机、礼宾人员等等各有数万。他们需要标志清晰的制服，在各个岗位上让人们一目了然。

于是，为这些工作人员设计工作服就成为一个很特别的工作。由于岗位职责、设计要求、材料工艺、人员数量、着装时间等各不相同，世博服装的需求十分复杂。为向全世界展现高水平、有特色的上海世博服饰形象，东华大学早在2008年6月就依托学科优势，成立了由服装学院副院长、学科带头人刘晓刚教授领衔的世博职业服装设计项目团队。该团队规模近50人，集结了东华大学在服装设计、平面设计、服装结构、材料、染整等多个专业技术领域的优秀专家学者和骨干教师。

为了能抢到这一千载难逢的、“光荣而又艰苦”的设计任务，刘晓刚率领的上海东华大学团队在反复研究历届世博会职业服的过程中发现，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加深文化内涵，已成为各主办国设

计世博职业服的趋势。于是他们提出了上海世博会职业服的设计理念：以“勤俭办博、科学环保、欢乐时尚、和谐多元”为方针，以“乐、和、礼、幻”为四大主题，蕴含欢乐、和谐、礼仪、科技的寓意。谈到四大主题时，刘晓刚说道，要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抽象的主题通过世博载体之一的服装变成具象的形式。具体地讲：“礼”是强调我们东方的礼仪，因为我们是礼仪大国；“乐”就是快乐，快乐办世博；“和”则体现我们全世界的主旋律应该是和谐，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主旋律；“幻”是科技未来感，历届的世博会都是讲究科技和超前的东西。

回想当时竞标的情景，刘晓刚至今仍显激动：“竞标那天来了近百家设计团队，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竞标大厅，大有来头的外国设计团队也不在少数。但那

天我们是有备而去的,之前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的‘四大主题’等设计理念可谓‘独树一帜’,把在场的世博局领导和国内外评委给镇住了。说来好笑,上了几十年课、见过国内外不少大世面的我,那天还是有些激动和紧张。在答辩的最后阶段,为了进一步打动评委,我大声说道:‘我不仅是服装设计师,同时还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的社会责任感驱使我肯定能高标准完成这次非同寻常的设计任务!’现场先是一愣,随之而来的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刘晓刚就率领团队全力开展设计工作,向世博局提交多套完整设计方案、200余款不同岗位服装设计稿。在世博局先后组织的五轮评委会评审中,他们设计的服装均以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最终,东华大学提交的服装设计方案成功中选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参观者服务、礼宾接待、司机等除保安服以外的四大服装类别。

“上海世博会职业服可一衣多穿、能长能短”

世博职业服装不仅要外观漂亮,而且要“内涵丰富”。为了使面料达到环保、科技、吸湿、排汗、挺括、抗皱等要求,刘晓刚他们运用了东华大学的科技元素,仅面料染整技术一项就蕴含东华大学8个以上的专利运用。生产工序很简单,难就难在从无到有的研发。

刘晓刚向笔者介绍,为确保这次设计圆满成功,除了服装设计系的“精英”倾巢出动,东华大学平面设计系的所有骨干老师也都调动起来了,最多的时候有几十人。“我们的办公室已经不够用,只好借用学校的一个电脑室办公,中午和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又借了一个大教室。老师一排一排地坐着,大家一起吃盒饭,像上课一样吃饭,很壮观的。设计过程中,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那段时间我们的睡眠时间严重不足,刘老师没睡下,



刘晓刚代表

大家也就不会睡。最后交稿前,为了斟酌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刘晓刚教授曾连续工作48个小时。大家全是义务劳动,但都很开心,无怨无悔!”刘晓刚的助手曹宵洁博士兴奋地回忆道。

此番设计的每一类别的世博职业服,都包含多套服装和配饰,加起来一共30多套。考虑到世博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需要以及世博会184天的长周期,此次世博会所有服装都包括了长短款,并涵盖春、夏、秋三季。为了体现“勤俭办世博”的原则,刘晓刚团队就服装进行了一些灵活的结构处理。不少工作人员服装有可加长可变短的脱卸等“变形”功能。比如说,春天的服装加个袖子到秋天就可以穿了。短袖的T恤可加长袖,也可灵活拆下,是可脱卸式的。长裤变中裤,中裤变长裤都是可以的。这样可以一衣多穿,因为上海的夏天特别热,但是到了初秋,到了晚上志愿者可能会冷,如果做两件衣服就会是种浪费,所以这种可脱卸式的就比较经济。还有,就连一个小小的马甲,也费尽了大家的心思。马甲采用了多功能的立体袋,方便志愿者放置物品。马甲上的拉链采用的是反光材质,以保障夜间志愿者的安全。马甲的内层为网眼材质,具备良好的透气性。包括帽子、鞋子、水壶、背包,还有雨披,这些都是根据防护的需求设计的。像防雨夹克,是非常轻薄的,而且它收起来就巴掌大小的袋子在里面,平时也可以随身携带。

同时,服装的设计还要表现团队感、形象感,能够醒目易见地传递快乐。色彩上立足奉献、热情、时尚,让人感觉温暖。而衣领内侧彩虹渐变的设计则传递着阳光般的热情。

刘晓刚介绍,这些高科技并不是随口说说的,每套样衣都经过权威部门的检测,并出具了专门的报告。由于一衣多穿可变长短,所以,这将极大节约上海世博会的制衣成本,从而避免资源的浪费。

“上海世博会要充分体现上海元素”

刘晓刚表示,上海世博会职业服装除添加中华服饰代表元素外,还充分考虑到了海派文化的元素。讲到海派文化,人们通常会想到用白玉兰来表现海派特色。但是这个白玉兰又不能太图解,既要把它变得有点抽象,又要使它有亲近感。比如,参观者服务人员与礼宾人员接待制服中,上海市市花——白玉兰造型被运用到女裙的裙身造型和服装的领口、袖口,甚至盘扣花型、衬衫底纹上。不仅有白玉兰的“隐隐约约”,“志愿”两个字里的那颗“心”,以及世界地图等元素也都被添入世博服中。刘晓刚透露,即使拉链、纽扣这样的小配件,也是一个都不马虎,与世博主题充分融合。

上海元素还有另外一种,比如旗袍,尤其一讲到上海,人们第一反应就是旗袍。因为世博职业服装属于礼服类的,需要设计的比较职业,鉴于旗袍给人的感觉比较传统,所以需要设计得更加国际化一些,更加未来化一些。当然里面还有旗袍元素,比如有立领的元素,这样整体就比较有未来感了。

另外,志愿者服装包含T恤、裤子、马甲、防雨夹克以及帽子、背包、鞋子、水壶等系列配饰。参观者服务人员、礼宾接待、车队司机等工作人员的制服则包含衬衫、外套、裤子、裙子、旗袍、领带、丝巾等。“无论是服装还是配饰,我们都充分考虑到其功能性与世博主题、上海元素的结合。”刘晓刚说。✶

2010年4月18日,武汉市公安部门出台了《道路交通排堵保畅工作督导、奖励和问责的暂行规定》,两名参与排堵保畅工作的民警,因未认真履职,被扣发当月奖金,取消全年评先资格。

事实上,这一问责制度的诞生,要追溯到3个月前的武汉市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高训禧所提出的那一份代表建议……

高代表“议”堵

文/彭劲

原本只是打算草拟个纲要,但很明显,高训禧对自己动笔前的预期字数估计得略有不足,仅仅用了半个晚上,他笔下的《启动“黄鹤行动计划”缓解武汉市交通堵塞建议》就已经写满了近3000字。这使得他不得不在大会工作人员统一配发的议案草稿纸的后面,又附加了6张驻会酒店提供的稿纸。

“想说的实在太多,不知不觉下起笔来就收不住了。”高训禧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是一份在武汉市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提交的代表建议,内容是要求市政府增加专门的排堵警力,以缓解目前交通拥堵的现状。值得一提的是,加上此前曾提过的“修建井字路联通道”、“市区交通流量改限速为提速”等建议,这已经是高训禧连续三年在市人代会上提交有关交通治“堵”方面的代表建议了。

然而,这样看似带有某些惯性的履职方式,在他看来并不奇怪,“老百姓关心什么,我自然就会提什么。”高训禧认为,“治”堵实在是有关职能部门负责的事情,作为人大代表,自己提的这些建议,用“议”堵更为合适一些。

一“炮”成名

算起来,高训禧当人大代表的时间

其实并不短,从2003年当选市人大代表至今,已将近7年时间。性格耿直,凡事较真的他,很快便开始频频在各种场合以代表言行力促职能部门改进工作,为选民鼓呼。

在2007年武汉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江岸代表团小组会议上,高训禧提出,武汉市交管部门应减少罚款,对于轻微违反交规的行为,当以批评教育和警告为主的建议。

“现在交通罚款太多了,一年竟超过100多万笔,金额达1.5亿元,群众颇有微词。”高训禧说,不少武汉市的驾驶员每年需要准备几百甚至上千元来应对罚款,由此产生了心理负担。

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曾有报道说,武汉某大学老师因接罚单太多,看到交警就条件反射地停车,无奈去看心理医生。对此,高训禧认为交通执法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市民遵守交通规则,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处罚为辅,不能以罚代管,把罚款当作创收手段。

让高训禧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人代会上这番多少带有点“炮轰”交管部门意味的言辞,却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共鸣。《湖北日报》、《法制日报》、人民网、新浪网、央视经济频道等多家省内外主流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予以转载,而新华社更是为此配发了标题为

《如此执法该重新打量》的署名评论。

“那段时间,几乎只要谈到武汉交通罚款,就会提到‘高训禧’三个字。”他半开玩笑地说,那次“炮轰”不仅让自己成了“名人”,也带来了一些压力,“但只要是能促进政府转变作风,改进工作,这些我都不在乎。”

事实证明,此番“炮轰”,成效斐然。一年后,两家本地媒体接连爆出消息称,武汉市将以路面交通秩序和道路安全畅通程度取代原来“每人每天15起”违法纠正量,作为对路面交警工作的考核标准。这一转变执法思路之举,被高训禧称赞为交管部门的一大进步,而他本人也被聘为特邀交通监督员,这让他坚信自己找准了履职的方向。

再开“偏方”

人大代表和交通监督员的双重职责,促使高训禧把更多的视线投向了与每个市民息息相关的交通出行方面。

“近几年,老百姓对交通拥堵问题的意见很大,毕竟,谁都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路上。”属于“有车族”的高训禧对此亦有切身体会,有时办事只需要几十分钟时间,但办事路上却往往要堵上几个小时。

“事实上,作为武汉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见证者,我们也明白这是城市发展所必须承受的一场‘阵痛’。”高训

禧说,用市长的话讲,现在武汉市正处在一个长达五年左右的交通黑暗期之中。

然而,对政府工作难处的体谅和理解,并不意味着人大代表可以坐视不理,高训禧开始积极酝酿在人大会上再次针对交通问题提交有关建议。



2010年,高训禧代表在人大会议现场发言

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为了保证建议质量,这一次高训禧做足了功课。不仅在会前向有关部门调阅了大量资料,还专门安排了几个员工前往武汉市区各街道和堵点,对高峰期交通流量、硬件设施建设进度等数据进行现场记录和测算。

“仅仅‘炮轰’并不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向政府部门提供有助问题解决的可行性建议。”高训禧说,人大代表的职责要求自己不仅要当好“裁判”,更要当好“智囊”。而除此以外,他也相信,以数据为依托的合理化建议要比批评性的意见更具有说服力,更让政府部门乐于接受。

2009年市人代会上,针对代表们热议的交通拥堵现象,高训禧一口气向交管部门开出了三张治堵“偏方”:多建“井”字型道路、市区交通流量限速改提速、鼓励私人停车场对外营业。

“称为‘偏方’,是因为这些建议对目前实施的交通规划提出了不同声音。”高训禧解释说,比如市政府大力修建的环线快速道,相对来说车辆分流慢,堵车后不易疏散,而“井”字形道路呈发散型扩展,一旦某一点发生塞车,后面的车辆可从3个方向疏散,其分流

能力是环形道路的3倍。

而对于市内干道上常见的“限速5公里”、“限速10公里”标牌,高训禧则认为限速无形中加剧了交通堵塞,“只有让车真正跑起来,才能缓解汹涌的车流给有限道路带来的压力。”

此外,公共停车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车辆的需要,许多车只能在主、次干道上停放,让本来就不宽敞的马路变得拥挤不堪。鼓励私人停车场开放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还路于行”。

接力“议”堵

尽管高训禧的建议,在有关部门看来实施有一定难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关注交通,积极“议”堵的热情。

2010年人代会上,高训禧有话必说的本色不改,一份长达3000字的“超大号”建议不仅在众多代表建议中显得分量格外厚重,连闻讯赶来的记者都甚感如获至宝,纷纷索求。“前前后后复印了好几次,要的人实在太多。”

这份代表建议的标题很长,主标题是“启动‘黄鹤行动计划’纲要全民保畅通”,而副标题则是“关于缓解武汉市交通堵塞建议之一”。

“最初我是准备当作议案原案来提的。”可写着写着他就发现内容越来越多,从分析问题成因到提出解决方案,几乎全替政府职能部门考虑到了,这让高训禧感觉到似乎有“越位”之嫌,于是便在题目中加了“纲要”两字。随后想了想,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妥,“毕竟一个人的思路是有限的,或许还有我没有考虑到的方面,所以又在副题上加了‘之一’两字。”

事实上,高代表对标题的慎之又慎不无道理。可以佐证的是,建议中仅是引用的各种数据就多达50余处,囊括了堵塞现状和成因、分布特征、机构设置、绩效考核等九大方面。核心内容是建议市政府增加一线警力,开展代号为“黄鹤行动”的专项排堵工作。

“平时发生堵车时可以体会到,有交警指挥疏通的堵点很快就能恢复畅通,而没有交警的堵点只会越来越堵。”高训禧说,堵情严重固然与近几年建设加快、车量增大、新手增多等客观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武汉市1000余名一线民警相比总长3000多公里的道路而言,明显感觉力不从心。

在北京、上海等地,仅电子警察就有1300套以上,而武汉只有区区200余套,这些都是导致堵情频发的原因。高训禧为此在建议中提出武汉市应该增加1000名一线交警,并设立专职“车辆排堵部门”,制定任务,考核绩效,力求做到“堵情就是命令,哪里有堵情,哪里就有交警”。

建议提交之后,能不能得到有效落实,高训禧一时还无从得知。但他坚信,排堵,绝不仅仅是他一名人大代表的责任,更应该是全体市民应尽的义务。

“取名‘黄鹤’,其寓意是自由飞翔和畅通。毕竟,没有广大市民的支持和交通管理人员的高效工作,即使我们有再好的交通硬件设施,‘黄鹤’也无法展翅腾飞。”高训禧对此依然充满期盼。✘



农产品信息发布体系 要集中权威统一

文 /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兴强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直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大震荡,美国场内期货交易却运行平稳,以独特的避险机制有力保护了参与其中的市场经营机构,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

仅从农产品信息角度来看,美国农产品信息采集、分析和发布工作集中在农业部。其中,农业部农业销售局(AMS)在全国各农产品主产州、批发市场、拍卖场及装运点等均设有市场新闻办公室,按每天、周、半月、月、双月、季度及每年形成数据和市场报告报送至华盛顿总部,由总部形成监测报告在美国农业部系统内共享;农业部农业统计局负责收集农场主定期报告并进行信息现场调查采集,提供及时、准确和实用的农业统计数据;海外农业局(FAS)承担着国际贸易谈判、收集和分析市场信息的职能;农业部与国家海洋气象局共同设立的联合农业气象局(JAWF)提供气象对作物影响报告,作为国家农业统计局进行作物评估的重要依据;农业部经济研究局(ERS)对国内、国际市场进行时时研究,为决策提供依据。

目前,美国由农业部市场服务局发布的反映农产品有关供应、需求、价格、趋势和发展等情况的“市场新闻报告”,和由农业部展望局(WAOB)牵头、其他八个部门参与的对全球农产品的产量、消费量、贸易等状况进行估计和预测的月度《全球农产品供需状况报告》对

全球农产品市场影响巨大。在信息发布渠道上,一是农业部地方办公室直接将采集到的相关信息通过信息网络、电话咨询服务台、电传和录音信息提供给社会大众;二是农业部将相关信息汇总后通过新闻媒体免费向社会发布。

这一套农产品市场信息收集和发布体系的建立,在美国是拥有诸如《1966年信息自由法案》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障的,从信息资源采集到发布都进行立法管理;同时还有完善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发布相关制度支撑,比如信息资料保密制度、信息资料共享制度、农业信息发布制度。这一套比较完整、畅通灵敏且集中的农产品市场信息收集、发布体系,成为影响美国农业生产和销售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全球农产品价格的关键因素。

我国目前初步建立了官方的农产品信息发布体系,但在采集、发布方面还存在一些明显问题:比如信息管理部门分割,缺乏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农业信息发布制度不健全,信息发布立法滞后;市场信息供需矛盾,现有信息不能满足农村基层需求;农业信息发布渠道较少,基层农户较难获得信息或信息获得成本较高。对此,我的建议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根据我国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和发布工作现状,建立起集中、权威、统一的农产品信息发布体系。

首先,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

信息共享制度,建立统一农产品信息发布体系。建议由相关部门牵头,对国内多个部门相关农产品市场信息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实现涉农公共信息特别是数据信息的广泛兼容和共享。

其次,加强信息发布制度建设和信息立法。国家应加快信息发布立法的步伐,如此才能减少对信息发布的行政干预,增强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时效性。

第三,加大对农业信息采集、发布体系建设的投入。美国政府每年支出10亿美元用于农业信息经费,用于农产品市场新闻发布的年度预算就达2200万美元。相比较,中国对农业信息化的投入不够,“十五”期间各级财政投入约为10亿元,且主要集中在硬件设施建设上。

第四,探索有效信息发布方式,多渠道推动信息发布。除了对现代信息传播设施的建设和利用,还应把国家关于加强和改进农产品价格信息服务工作的相关精神落到实处,要求媒体把发布农产品价格信息作为一项服务社会的硬指标进行落实,广泛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定期、定时、无偿发布重要农产品的价格信息。

第五,在信息发布内容上,除了农产品现货市场信息外,鉴于期货价格的超前预期性及目前国内农产品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市场价格形成中心,故应将农产品期货价格信息作为重要市场信息予以采集、发布,传送到市场各环节特别是农民手中。■

寻访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徐建春：新中国第一个知青明星

文 / 本刊记者 夏莉娜



徐建春近照

她是20世纪50年代最早出名的知青先进人物。1950年，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急需各方面有文化的建设人才。她放弃继续上学或者进城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参加农业劳动。1951年春，她年仅16岁就被大家推选为互助组组长，带领农民搞生产，学文化，积极上交爱国粮。互助组先后被乡里评为“丰产组”，被区里评为“模范组”。1952年10月，她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国庆大典。回村后，她领导村民连年取得农业生产好收成。1953年春，她被评为全省小麦丰产模范。1954年2月，她被选为农业合作社社长。同年6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表扬积极从事农业劳动生产并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模范徐建春和胡兆坤，号召农村青年向他们学习。《大众日报》发表通讯《徐建春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人民画报》刊登徐建春的照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徐建春专题新闻片，在全国各地放映。接着《人民日报》刊出了《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的通讯。她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正式树立起的第一个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的先进典型。她的事迹鼓舞了当时那个年代在基层工作的年轻人。

她是第一届至第九届山东省人大代表，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从1979年恢复地方人大常委会以来，她先后任山东省常委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1998年退休，在这一岗位上任职时间近20年，是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间最长的领导之一。

新中国第一个知青明星徐建春，不久前在自己的家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身着海蓝色的真丝衬衫，满头银发，笑容慈祥，面对记者的提问，她以浓厚的山东口音，悠悠而亲切的调子，向记者娓娓道出早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往事，满怀深情地讲述了自己当年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情景。

在休息室为毛主席点烟

今年已过了75岁高龄的徐建春性情豪爽，记者希望看看她早期的照片，老人利落地起身，走起路来脚步“咚咚”地

响，两次在两层小楼跑上跑下地找来影集和她的代表证、出席各种会议的证件。

在影集中，有她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合影。1957年徐建春进京参加团代会，毛主席来到团代表们中间，和他们亲切交谈。谈话间，主席掏出一支香烟，徐建春见到桌上有一盒火柴，就上前给主席点烟。主席笑了，大家都笑了。这个温馨的瞬间被《中国青年报》记者拍下来，成为一张流传开来的照片。还有1958年毛主席在济南西郊麦田里和徐建春等山东的同志谈话的照片……每当看到这些照片，徐建春都会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永生难忘周总理的嘱托

徐建春一生见过总理的次数很多。这当中，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次是在1959年。那年北京建起了十大建筑，在国庆节期间对外开放。徐建春参加了国庆十周年观礼及团中央召开的会议，期间会议组织大家参观刚刚竣工的人民大会堂。她们刚走进人民大会堂，周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也来到了大会堂。见到周总理，她们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总理微笑着朝她们招手，示意她们过去，大家一齐来到总理和金日成首相周围。总理见大家都有点拘束，就笑着说：“来啊！金首相是咱们的客人，我来介绍一下。”总

理一边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询问情况，一边向金日成首相逐一介绍。当介绍到徐建春时，总理微笑着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金日成首相面前说：“她叫徐建春，高小毕业生，我们的知识青年，山东省年轻的人民公社社长。她是代表中最年轻的，今年23岁，是从互助组长、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社长一步一步干起来的。”金日成首相听到这儿，很高兴地拉起徐建春的手，不住地打量她，连连点头说：“好！好！”周总理接着说：“她来自基层，一个人民公社有四十几个自然村，近两万人口，不容易啊！”周总理关心地问她，平日工作累吗？人民公社这么大的摊子，又是刚刚成立，一定要好好干。最后，周总理还关切地对她说：“以后要加强学习啊！”

徐建春告诉记者：“此后不久，我就被送到北京农业大学专修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

山东代表团的“三只猪”

徐建春是我国早期的人大代表，她对记者说：“1954年我被选为第一届山东省人大代表。1959年4月起，我被选为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我记得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召开的。那时人民大会堂还没建好。从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开始，全国人代会就都在人民大会堂开了。第二届全国人大，我们山东代表团有七十多人。我和郝建秀、郎咸芬是山东代表团中年岁最小的三位，都是1935年出生，属猪的。大伙儿常开玩笑地说我们仨人是山东团的‘三只猪’。著名的电影明星赵丹也在我们山东团。赵丹说话很幽默，为人随和。他见到我们就故意用山东话说：‘你们三个女的，怎么老是凑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演的第一部影片《武训传》在全国公映，他演得真好，把那个武训演活了。我们一看见他就想到武训。他有时候就说武训的话：‘我穷得了不得，有个钱儿就攒起来办学校。’没想到后来竟对《武训传》掀起全

国性大批判，为穷孩子办学的武训竟成了大地主、大流氓。”

耀邦同志是我人生路上的良师

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山东代表团中，曾任共青团和共产党最高领导职务的胡耀邦是徐建春最熟悉，也是对她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

徐建春回忆说：“耀邦同志教给了我许多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位难得的良师。他的音容笑貌，高风亮节，至今仍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里。与他接触的很多细节，至今难以忘怀。我最早见到耀邦同志是1955年9月，我出席了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亲耳聆听了耀邦同志的报告。1957年2月，我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耀邦同志接见了出席会议的青年代表。他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是青年的榜样，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他还指着我说：‘啊，你是山东的高小毕业生、农业社长，年轻的社长。’接着神采飞扬地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带领广大青年作出更大的贡献。当时我非常激动，没想到耀邦同志对我记得那么清楚。可见，他对农村知识青年的成长是何等关心和重视。”

徐建春讲述道：“1959年的夏天，耀邦同志到我们公社参加劳动和调查研究时拍的。那时正好学校放假，耀邦和一起来的几位同志就住在后吕家村完全小学的教室里，用木头和高粱秸做成简易床。第二天早晨，我问耀邦同志休息得好吗？他高兴地说，没想到高粱米好吃，高粱秸铺的床睡起来也很舒服，就是蚊子多点。耀邦同志在大热的夏天锄地、拔草、浇水，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有一次，在劳动休息时，我对耀邦同志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各地都在放卫星，吹嘘夸大自己的粮食产量。我的压力很大，有些想法、看法只能压在心里，不敢说。不久前，我被邀请到聊城介绍小麦丰产经验，同时被邀请的还有河南的一

位同志。我介绍亩产小麦500斤的经验，而河南的同志介绍小麦亩产3726斤的经验。当时，他的话音未落，便引起了台下一片议论声。上午发完言，下午我的嘴上起了许多水疱，饭也吃不下去。我回到公社把去聊城介绍经验的情况一说，大家纷纷提议修改当年的小麦亩产计划。最后修改为亩产1500斤，比上一年翻两番……’我讲完后，耀邦同志看出我的难处，就说：‘没关系，亩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多报，也不要少报。多报了，老百姓分不到粮食怎么办？一定要实事求是。’耀邦同志不但没有批评我，还鼓励我们要说实话，这对我触动很大，使我懂得了在任何时候都要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说真话，办实事，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后吕村和耀邦同志相处的日子里，我深切感受到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人格和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

最后，徐建春神色黯然地指着一张与胡耀邦的合影说：“1988年夏天，我在烟台东山宾馆去看他时，照了这张相留念。万万没想到这是与他最后一次见面。”✿

徐建春简历

1935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掖县后吕家村。1950年年底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1951年春起，任农业互助组组长、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1958年任人民公社社长。1959年在北京农业大学学习人民公社经营管理。1962年在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学习。1964年7月起，历任共青团山东省副书记、山东省委常委、掖县县委副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起任山东省常委，并于1979年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3年后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1998年退休。第一届至第九届山东省人大代表，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大至十二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共和国“掌柜” 的为国理财经

文 / 刘可韵

陈云曾经把自己的思想方法概括成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 (1905年—1995年)

陈云一生管理过党务、政务、军务，连续当过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担任过《陈云传》副主编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曹应旺说：“陈云在中国人人上上下下的印象和记忆中，主要的不是‘党头’、‘军头’、‘政头’，而是抓财政经济工作的‘财头’，他对党和人民最突出的贡献也是在经济建设方面。”

“在财经工作这一点上，我们是依靠陈云同志的。”周恩来也说。

陈云同志曾经在多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力挽狂澜，为我们党领导的财经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1944年3月，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当时，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后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困难基本解决，生产自给获得很大发展。但是，由于贸易入超和大量生产资金的投放，以及军费的增加，1943年边币发行量增加了13倍。陕甘宁边区开始金融波动、物价猛涨，贸易、金融和财政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面对边区物价波动，陈云巧用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对边区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采取手段化解，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4年夏天，边区政府一次短时间内就收进黄金万两，赚取了大量金价波动的差价，充实了银行准备金，还进口了大量必需物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当时的工商业资本家一度认为，中共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政治方面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经济工作

缺乏人才，要打0分。

1949年5月11日，陈云就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通过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财委主任陈云在一系列财经决策和重大财经战役上，又一次出色地发挥了财经统帅的作用。

当陈云成功地组织与领导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工作之后，当初看不起共产党经济领导能力的工商业资本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在经济工作上也是有奇才的，并称陈云为“共产党的财经专家”。对此，毛泽东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又一个关口。在这个关口，陈云同样又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经济呈现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建设和民生关系不顺等乱象。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粹‘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局面下，陈云率先提出了经济调整的主张，并在邓小平支持下组织领导了1979年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工作。

经过三年的经济调整，1982年，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50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比1978年增长38.3%。可以说，1979年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不仅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而且，在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时，陈云倡导经济体制改革和支持对外开放的思路越来越清楚。

陈云一辈子主要同中国经济中的大风大浪打交道，并创下了彪炳业绩。这一场又一场财经战役的胜利，既是陈云业绩的标志，又让陈云同志积累了丰富的财经领导经验。他曾经把自己的思想方法概括成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曾经说：“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去弄清楚全面情况，弄清楚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由此，他讲到交换、比较、反复。对于交换，他认为“在交换意见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决不要生气。他们的意见，对的或者错的，都有益处。正确的东西，就是在否定错误的东西中生长起来的”。对于比较，他认为“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性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对于反复，他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

其实，陈云这些全面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不仅仅适用于我们的财经领域。★

我在人民大会堂的十年

文 / 王敏

我在人民大会堂工作过十多年,对人民大会堂怀有深厚的感情。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美好的岁月,便心情激动,思绪万千。

1959年3月,我们一批23名年轻人,从天津来到北京,同全国其他省、市来的同志一起,荣幸地成为人民大会堂第一批工作人员。到1970年,我随军离开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了十二个年头。

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是一群走出学校大门不久的热血青年,对未来充满幻想和希望。人民大会堂是国家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是全国人民瞩目和向往的地方。我们自己能到北京来,到人民大会堂工作,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身边工作,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感到无比幸运,觉得自己就是最幸福的人。

在集训期间,我们住在国务院机关招待所,去中南海学习和实践。集训期间的日常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住集体宿舍,编为班、排组织。集体行动都必须整齐排队,内务要求整洁划一。每天早晨出操,白天上课实习,晚上点名讲评。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保密制度,不许单独外出,不许向外打电话,写信不能暴露工作地点和工作情况,不该知道的事不去打听,等等。虽然生活紧张,制度严格,但大家心里总是乐滋滋的,整天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学习和工作也总有旺盛的热情和使不完的干劲。

集训结束后,天津来的23名同志,分别分配在人民大会堂管理处下属的几个科,我同杨茂兰、路普、杨维起等10多个人分在服务科。当时科长是马双怀、贾万恒、张晓希等同志。服务科下设管段和班组,我在科里当内勤干事。服务科承担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小礼堂,大、小会议的招待服务工作,及平时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开会、接见外宾等招待工作。

服务科的工作光荣而艰巨,要求严格。安全、卫生、服务质量,处处要一丝不苟,不能出一点差错。每当重

要活动,处和科的领导都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并亲自到场,指导检查服务工作。领导和老同志对工作尽职尽责、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这些年轻人,和后来一批又一批的更年轻的新同志,从领导那里,从老同志那里,学习并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继承了热爱服务工作和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工作忙时,连续几天加班加点,大家毫无怨言。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朝气蓬勃,埋头苦干,一点一滴,周到细致地做好服务工作。就是端一杯茶倒一杯水,都高标准、严要求,绝不马虎。服务科内勤工作,要求脑勤、手勤、嘴勤、腿勤,默默奉献,潜心工作,精益求精,当好领导参谋。内勤干事每天都要到有接待服务任务的管段和班组现场,了解情况,准确及时向上反映。做到日有日报,周有周报,月有月报,半年小结,年年总结。反映工作情况,总结经验收获,不断提高服务工作水平,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服务工作的制度规定和质量要求,服务科的每个同志都铭记在心。大家用自觉的服务意识,娴熟的服务技能,一流的服务效果对待工作,把做好本职工作,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是为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家机关的重大活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是用实际行动保卫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

大会堂的服务人员,多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严肃紧张的工作之余,是年轻人展示自己青春风采的时候。管理处团委根据青年人特点,组织成立了文娱俱乐部,下设小乐队、合唱队、舞蹈队等。平日业余时间组织练习,开展文体体育活动,节假日还安排演出。合唱队自编自演的大合唱《人民大会堂之歌》,反映大会堂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多次演出,受到好评。周总理、李先念等首长也来观看。周总理还一边用手打着节拍,一边同大家一起唱。中央首长同服务人员同娱乐,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和温暖,情绪受到了极大鼓舞。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使人民大会堂内部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还组织春游和秋游,爬山登高,欣

赏北京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在这些活动中,大家总是欢天喜地,尽兴游玩,处处歌声荡漾。

中央领导同志对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十分关心和爱护,经常询问大家的学习、工作情况。毛主席还多次同服务人员合影。

1962年10月的一天,毛主席接见外宾后,又同在场的服务和警卫人员一起合了影。我也十分荣幸地站在毛主席身边合影留念。这是我一生中 most 珍贵的一张照片,我一直非常珍爱地收藏着。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还抽空到职工食堂同我们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告诉大家要好好学习,要学政治,学文化,学习业务做好本职工作,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文革期间,周总理同大会堂的全体工作人员一样,胸前总是佩戴着一枚有人民大会堂图案和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毛主席像章。周总理联系群众的人格魅力和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光辉榜样。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的亲切关怀、谆谆教导,激励着我们健康向上,更加热爱服务工作,做好服务工作。

大会堂党委和领导十分重视加强党、团组织建设和,从政治思想上关心教育工作人员。党组织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制度,每个党日活动时间,都组织党员学习,过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共青团开展青年工作,生动活泼地教育广大青年,在各项活动中培养党员,使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加入党的组织。我就是在1959年5月被评选为人民大会堂的优秀共青团员,并获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团委颁发的五四奖章,第二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批服务人员,大多文化程度不太高。管理处领导根据大家不同文化层次,组织成立了职工文化学校,分为高小、初中、高中和电大等几个班。从外面调来优秀教师给在职学生上课,大力提高服务人员文化素质。大家为了适应人民大会堂特殊工作任务的需要,个个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在繁忙的服务工作中,边工作,边学习,边提高,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在人民大会堂读完了高中班,又上了电大中文系,对我搞内勤工作的业务能力和文字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

处领导既重视提高大家的政治、文化素质,也十分重视大家的身体健康。人民大会堂工作特点,是工作人员整天工作和生活在大礼堂内部。为使大家能有健康的体魄,适应紧张的服务工作,管理处要求全体人员每天早晨出操锻炼,处、科领导带着大家围绕大会堂跑步、做操。上午和下午工间休息时,集体到东门外做工



1962年10月,毛主席接见外宾后,同在场的服务和警卫人员合影(前排右四为王敏)

间操。平时也安排干部同服务员一起搞卫生、做清洁,参加体力劳动。此外,大会堂还办了个小农场,工作人员被分期分批抽去农场劳动,每人每年至少劳动半个月。大家都觉得这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人人争先恐后,满腔热情地参加劳动。既加强了身体耐力锻炼,也增强了劳动观念。大会堂还特别提倡“条件越优越,越要节俭”的精神,要求大家在工作中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因此养成了人人自觉勤俭节约的美德。

为了更全面地培养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在国家政治生活运动中,管理处也抽调人员去参加,使其在社会活动中经风雨、见世面。1965年,我被抽调参加国务院机关和清华大学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去北京平谷县韩庄公社参加了几个月的四清工作,与农民同吃同劳动。1968年,我又被抽调参加8341部队到北京丰台二七车辆厂支左,同工厂师傅一起生活,后来因去干校劳动才终止。参加四清、支左和干校劳动,使我更多地接触社会实践,开阔了眼界,政治思想上进一步成熟,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体质也有增强。遗憾的是从干校回来后我就随军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深爱的人民大会堂。

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岁月里,我的心情总是阳光灿烂、健康乐观的。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最难忘的时期。大会堂组织把我从一个懵懂青年,培养成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干部。我十分珍惜这段历史,以这段历史为光荣,以这段历史而自豪。在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处处以自己是人民大会堂出来的人严格要求自己,发扬人民大会堂人的精神,做到一言一行为人民大会堂争光。离开了人民大会堂,就像离开了家,不论走多远,不论时间多久,人民大会堂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领导的培养教育和亲切关怀印在我的脑海里,与同事们一起相处的美好时光和深厚诚挚感情永远记在我心里。✿

应时而生的清末“立宪团体”

文 / 侯宜杰



1906年，礼部尚书戴鸿慈和闽浙总督端方带队赴欧考察立宪制度。这是在瑞典爱立信总部

图

渐传入中国。有些士绅开始学习研究，认为中国要想避免外国侵略，就应学习西方国家，改革旧的制度，由此出现了一批维新人士。以后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士绅受到影响的越来越多，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有人就正式提出了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19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了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过去，商人不论多么豪富，历代王朝均轻视商人，采取抑商政策，不承认他们的社会地位。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后，不独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就是绅士也投资于工商业。如江苏的张謇，他在1894年考中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不久其父病逝，请假回家。因为目睹国家日益衰败，从此放弃做官，转而致力于实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陆续创办了一些工厂和学校，成为有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博得很大声誉。

此时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同于封建时代，上升到士绅的行列，有的称之为绅商。至20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成长为一支独立的先进的社会力量。可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继续对华进行资本和商品输出，极力排斥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清政府虽然采取了鼓励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官府的刁难敲诈，苛重的捐税，层层勒索的关卡，都严重阻碍、束缚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参与掌握政权，改革政治，保护本阶级的利益。

1904年清政府倡导商民在省会和商业繁华地区设立商务总会，中小城市设立商务分会，村镇设立商务公所，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以各级商会为纽带，加速了力量的凝聚。

由于商会总理、协理和会董均由选举产生，议事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资本家还受到了民主训练，增强了组织观念。他们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初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和团结合群的重要意义，倡议成立团体，议决国家大政。政治参与意识也非常强

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均严厉禁止人民结党立会。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害怕汉人反抗，禁令尤严。1898年戊戌变法时维新志士发起成立了极少数团体，不久被慈禧太后严禁。

但时隔8年，立宪团体却取得了合法存在。

所谓立宪，是指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形式之一的君主立宪制度。立宪团体旨在推动清政府改革封建专制政治，实行这种宪政，是政治性的组织，其成员均为士绅和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因此，要了解立宪团体何以会在此时获得合法存在，必须从社会的发展和其成员政治思想的转变谈起。

绅商阶层的崛起

士绅也称绅士，指地方上有一定声望或有功名的人，如不愿当官的进士、举人、秀才，退职回乡的官员，地主等等。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这个阶层的人在思想意识方面完全属于封建主义。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闭的国门被列强的炮舰轰开，由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逐

烈,主动要求实行自治。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觉醒为立宪团体的建立创造了物质条件,奠定了阶级基础。

知识分子开始转化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队伍也开始了全面的转化。1900年慈禧太后愚蠢地决定同八国联军开战,结果战败。在仓皇出逃途中,她感到脸面丢尽,为了维护统治,下令实行新政,兴办实业,推广新式教育,奖励留学。以前,中国派出的留学生极少。

此后,知识分子大批到国外留学,尤其是近邻日本。这些留学生学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知识,耳濡目染了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事实,知识结构基本改观,大部分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思想意识发生根本变化,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之下,要挽救中国不致灭亡,进一步富国强兵,只有铲除封建专制独裁政治。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主张采取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皇帝,实行民主立宪,属于革命派。另一部分反对以暴力手段推翻皇帝,主张进行和平改革,实行君主立宪,成为立宪派。由于推广新式教育,国内的学堂渐次增多,1905年彻底废除了科举制度,新式教育便完全取代了旧式教育。旧的知识分子再也不能依靠旧知识当官和谋生,不得不接受新的知识和思想,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谋取个人的出路,被迫转化为新的知识分子。

战争推进立宪运动

1901年9月,清政府因在八国联军之役中战败,同11个国家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人民的灾难愈益严重,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一切先进爱国人士都痛心疾首,迫切要求在政治上来一番根本改革,以改变国家又贫又弱的面貌。于是,君主立宪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开始兴起。

大力宣传君主立宪思想的首先要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他经过认真研究,比较了世界上各种政体,认为君主立宪最为优越。他阐述了宪政思想,尖锐批判了专制政体,根据世界大势及中国的实际,劝告清廷猛醒,速行立宪,并设想了实施预备立宪的次序。在日本的部分留学生也将君主立宪作为救国方案之一。国内的士绅甚至少数官员同样主张实行立宪,并展开了广泛宣传。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结果实行立宪的小日本战胜了实行专制的大俄国,立宪派人士受到启示,一致得出结论:专制必败,立宪必胜。日俄战争也有力地刺激着其他人士的觉醒,相信立宪可以救亡图存,连许多守

旧人物也转而鄙弃专制,投入立宪运动的洪流中。

此后立宪思潮迅即高涨,立宪的声浪响遍各地,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立宪运动的高涨不但表现为呼声的普遍高昂,人数的骤然增多,还突出地表现在立宪派开展的实际活动上。日俄战争刚一爆发,江浙的立宪派人士就进行了紧急磋商,开始策动地方和中央的高官。张謇此时也加紧了活动。不断与两江总督魏光燾、湖广总督张之洞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并为他们代拟立宪奏稿。又两次写信给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听说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及其儿子商部尚书载振有赞成立宪之意,还加紧催促赶印《日本宪法义解》,分送宫廷和达官贵人。浙江的著名士绅汤寿潜等也写信给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请他认清形势,果决地倡导立宪,派人到国外调查宪法。立宪派人士的活动终于促使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派遣五位大臣出国考察政治。

立宪派非常重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指出:要想振兴中国,除了大力发展工商业,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他们要求政府彻底改变轻视工商业的偏见,奖励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呼吁国民加大力量兴办工商业,夺回落入外国人之手的利权,挽回国家命运。同时提出许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建议,而最重要的就是确定立宪政体。他们极为看重资产阶级,将其视为社会的脊柱,积极鼓励资产阶级参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主张资产阶级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向政府夺取权力,或操纵政权。

在绅商阶层中,有文化的资本家其知识结构已经资产阶级化;缺少文化的资本家忙于经营者多,缺乏政治理论和思想武器,政治上的进一步觉醒和行动有赖于本阶级的先觉之士去启发和导航,立宪派说的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肺腑之言,所以二者很快结合起来。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旨以后,立宪派以为朝廷既然决意立宪,就不能不向立宪国家学习,允许政党、社团存在。同时他们认为,只有政治团体的舆论才有价值,只有政治团体才能承担起对国民进行宪政教育和号召国民的责任,才能胜任改造监督政府的工作,才能为组织政党、培养政党的执政能力做准备。于是,立宪派立即着手筹建立宪团体。

同年12月,立宪团体首先在立宪派集中和资产阶级势力雄厚的上海建立,继而汤化龙、谭延、丘逢甲分别建起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等团体,梁启超等人也在日本东京建立政闻社。

这些不断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民间立宪团体逐步转化为晚清宪政改革中最务实的推动力量。☐

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的立法

文/李倩 石宏

在《法律适用通则法》(以下简称《通则法》)实施前,日本的主要法律适用规范是1898年制定的《法例》。《通则法》是日本于2006年在对《法例》内容进行重大修改的基础上形成的。

《通则法》适用的范围

《通则法》没有规定本法仅适用于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关系,也没有具体列举何为“涉外因素”。日本专家认为,准确定义何为“涉外因素”相当困难,采取具体列举重要连接点的方式界定“涉外因素”的做法也不可取。原因如下:一是决定某种法律关系是否适用冲突规范的因素很多,具体列举难免挂一漏万,且日本学者对将哪些因素列举出来也有不同意见;二是在法律适用中,法官应找到与案件事实最密切的法律予以适用,因此原则上应将所有国家的法律规范同等对待,具体列举通常是将本国认为重要的因素吸收进来,而较少考虑被他国认为重要的因素,这与应同等对待所有国家法律规范的国际私法原则相违背;三是一些与国内相关的合同,并不一定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也可以选择适用外国法,只要适用该外国法不违反日本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四是从其他国家的立法看,多数国家不明确规定这一问题,日本的做法与这些国家的做法基本一致。

日本专家建议,中国立法者对这一问题可采用以下立法模式解决:一是采取比利时等国家的做法,不明确规定这一问题;二是仿效德国等国家的做法,概括性的规定“案件事实与外国法有关联”的民事法律关系可适用冲突规范;三是若必须列举重要的连接点以避免法官对某些涉外因素视而不见,也应当采取开放式的列举方式,规定一个兜底条款。

国籍和惯常居所地

国籍和惯常居所地是《通则法》规定的用于确定民事关系准据法的两个重要连接点。这两个连接点主

要用于确定民事行为能力、宣告死亡、婚姻家庭、扶养、监护、继承等人身关系的准据法。

日本专家介绍,以国籍作为人身关系准据法的主要连结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当事人以某国为其国籍国,不但表明该国与当事人具有较强联系,也表明当事人对该国具有较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二是国籍一般不会频繁更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透明性,可以避免被滥用;三是运用起来比较方便,减少了法官的负担。

《通则法》以惯常居所地代替了住所地,在整个法律中只有个别条款采用了住所地这一概念。日本专家介绍,这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为了与海牙国际公约相协调。日本加入了《海牙扶养义务法律冲突公约》和《海牙遗嘱方式法律冲突公约》这两部国际公约,公约为了协调各国的意见,采用惯常居所地作为确定人身关系准据法的主要连结点;二是各国对住所的界定差异较大,法官不易确定,给法律适用带来困难;三是惯常居所地一般是当事人工作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当事人财产的主要所在地。与住所地相比,当事人与惯常居所地的关系更为紧密。基于此,日本在确定人身关系准据法时,以国籍为原则,以惯常居所地为例外,基本不考虑住所地。

反致

反致涉及根据一个国家的冲突规范适用他国法律时,是否包括适用这个国家的冲突规范。在制定《通则法》时,日本对是否规定反致制度有较大争论。有的学者认为,立法者一般是根据某一法律关系的固有性质选择与该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作为准据法,承认反致实际上破坏了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建立起来的准据法制度,还有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恶性循环”,达不到制定冲突规范的目的。立法者并没有采纳这种意见,仍规定了反致制度,其理由是:一是日本《法例》早已规定了反致制度,从多年的实践看,并没有出现反

致导致法律适用“恶性循环”的案件；二是反致可以增加日本本国法适用的机会，减轻本国法官查明外国法的负担；三是反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本国法主义和住所地法主义产生的对立。

《通则法》第41条规定：“根据本法规定应当适用当事人本国法，而依当事人本国法应适用日本法的，使用日本的实体法。但是依本法第25条（含第26条第1款及第27条准用的情形）或者第32条应依当事人本国法的情形除外。”日本专家介绍，理解《通则法》第41条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根据该法，适用当事人本国法的领域主要涉及人身关系，例如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监护、婚姻家庭、收养、继承等。因此，日本反致适用的范围仅限于人身领域，合同、侵权等领域原则上不使用反致。二是该法第25条关于婚姻效力的规定以及第32条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不使用反致。根据这两条的规定，婚姻效力或者父母子女关系都是采用双方当事人共同的连接因素。例如第25条规定，婚姻效力首先适用双方的共同本国法；没有共同本国法的，适用共同惯常居所地法；没有共同惯常居所地法的，适用与夫妻双方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这样规定的初衷是为了体现两性平等，若使用反致，就不能体现这一原则。例如，夫妻双方都是A国人，丈夫的住所在日本，妻子的住所在A国，现双方因婚姻效力问题在日本诉讼，根据日本法应适用双方共同的本国法，即A国法，若适用反致，依据A国的冲突法，婚姻效力适用男子一方的住所地法，即日本法。这种适用结果与日本法第25条的立法目的不符。

公共秩序保留

《通则法》第42条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根据该规定，外国法违反日本的公共秩序或者善良风俗的，不适用该外国法。日本专家介绍，制定《通则法》过程中，学者对规定公共秩序保留没有异议。争论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外国法适用后应如何处理。多数学者认为，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外国法适用后，应当适用日本法；有的认为，以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外国法适用后的处理方式应当灵活一些，并不必然以本国法代替外国法，可以适用该外国法中其他可适用的规定或者该外国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其他相关外国法的规定；还有的认为，排除外国法适用后，应当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重新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考虑到对这一问题有较大争论，日本立法者认为，《通则法》对此不作规定为宜，可由法官在实践中灵活处理。



日本议会大楼

二是是否在公共秩序保留外另设“绝对性强行规范的直接适用”条款。日本的反垄断法、外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利息限制法等都属于强行规范。有的学者提出，这些规范应该直接适用，当事人也必须遵守，没有适用其他国家法律的余地。法律应对此明确规定。立法者认为，这些强行规范应当直接适用，但明确界定何为强行规范非常困难。若不明确界定，仅设立内容抽象、模糊的条款，如规定“绝对性强行规范的直接适用”，又有可能给实务带来适用混乱。因此，不明确规定此问题，法官在实务中可以解释的方法用其他制度解决，例如扩大适用公共秩序保留。

自然人的行为能力

《通则法》第4条规定了自然人行为能力应当适用的准据法。与《法例》相比，《通则法》明确了两点。

一是仅规定了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准据法。《法例》规定，人的能力依照其本国法确定。有的学者提出，《法例》中“能力”的含义不清，是否包括权利能力也不明确，在实践中导致了理解不一。同时，考虑到涉及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出生、死亡等法律问题基本都与继承有关，可适用继承的准据法。《通则法》对继承准据法已有明确规定，立法者没有再单独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准据法，而是将《法例》中的“能力”修改为“行为能力”。

二是出于保护行为地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目的，在自然人行为能力法律适用问题上，很多国家在坚持适用当事人属人法的前提下，均设置相关例外条款，即在当事人依属人法为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如果依

照行为地法该当事人有行为能力,则应被视为有行为能力。日本《法例》也有类似规定,但其保护的主体仅限于在日本实施的交易。《通则法》扩大了适用范围,规定不论行为在何地实施,只要当事人在实施该法律行为时均在同一地,且依该地法律当事人有行为能力的,则应被视为具有行为能力。日本专家认为,这一修改体现了内国法同外国法的平等,更符合现代国际私法的理念。

合 同

《法例》和《通则法》均未就“合同”问题进行直接规定,而是使用“法律行为”的表述。由于物权法律行为、侵权、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已经在其他部分进行专门规定,该“法律行为”一般理解为仅限于债权法律行为,因此该“法律行为”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合同之债。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履行

关于合同的成立和效力,在当事人做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通则法》和《法例》一致,都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在当事人未作选择的情况下,《法例》采用的是行为地法,而《通则法》适用的是最密切联系地法,同时采纳了特征履行的理论,以实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可操作性,即如果合同的特征履行仅由一方当事人实施,则该方当事人的惯常居所地被推定为合同最密切联系地。对该项规定,日本理论和实务界一般认为,具体情况千差万别,许多合同并不能通过特征履行理论确定准据法,此时还是要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因此,特征履行理论仅应当作为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而不是独立的法律选择规则。

(二)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的特殊规定

《法例》并没有涉及这两个领域。《通则法》顺应近年来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出于保护弱者利益的考虑,对这两部分内容作了专门的规定。

1. 消费者合同

《通则法》对于消费者合同规定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排除适用。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通则法》第11条第2款规定,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则不能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消费者合同的准据法,此时消费者合同应适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二是消费者强制性保护规则的适用。《通则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对于消费者合同的成立及效力,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作为准据法,只要消费者向企业表达了应适用其惯常居所地法中强制性规则的意思,该强制性规则应予以适用。依

照该规定,只有消费者提出主张,才可以享受其惯常居所地法强制性规则的保护。这一点和欧盟的作法不同,后者没有设置这种条件。就此,有的日本学者认为《通则法》对消费者保护力度不够,但日本实务界认为,由法官对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和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进行查明并做出比较,会加重法官负担,也不利于节省司法成本,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因此,宜由当事人自行比较选择。三是例外规定。为了实现企业和消费者利益的平衡,避免对企业的正当利益造成损害,《通则法》第11条第6款规定,如果消费者合同与企业所在地有更密切的联系,或者因产品的国际流通企业对法律适用完全不可预测,上述旨在保护消费者的特殊规则将不适用。具体情形包括:消费者前往营业者营业地签订合同,或者消费者在该营业地接受合同的全部履行;签订合同时营业者有合理理由不知消费者的惯常居所地;签订合同时营业者有合理理由误认对方不是消费者。

2. 劳动合同

与消费者合同一样,《通则法》对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也作了特别规定。根据该法第12条第1款,对于劳动合同的成立及效力,如果当事人选择最密切联系地之外的其他法律作为准据法,只要劳动者向企业表达了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中强制性规则的意思,该强制性规则将得到适用。

婚 姻

对婚姻成立的准据法,《通则法》区分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例如法定婚龄、是否允许近亲结婚等,要同时适用双方当事人本国法的规定。对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重叠适用双方当事人本国法,主要是考虑到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涉及每一方当事人本国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政策选择等因素,因此适用条件要严格一些。与之相反,对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即婚姻方式),《通则法》则规定了选择性的连接点,既可以适用婚姻缔结地法,也可以适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本国法。日本专家介绍,这主要是考虑到婚姻方式不涉及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对准据法的设定要有利于使婚姻从形式上成立。这与国际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对婚姻效力和离婚,《通则法》规定了阶梯性的适用连接点。首先适用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本国法;没有共同本国法的,适用共同惯常居所地法;没有惯常居所地法的,适用与夫妻双方有最密切联系地法。该规定体现了两性平等原则。

继承

对法定继承的准据法,根据《通则法》第36条的规定,对于被继承人的所有财产,不区分动产和不动产,统一适用被继承人的本国法。日本专家认为,对于法定继承,虽然有的国家区分动产和不动产规定了不同的准据法,但对于被继承人财产分布在不同国家或者区域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遗产受多个法律支配的情况,给法院查明法律带来较大困难。与之相反,不管被继承人的财产分布在几个国家,也无论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统一适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简单方便,有利于纠纷及时解决。在立法过程中,也有学者建议法定继承统一适用被继承人的惯常居所地法,但立法者认为,惯常居所地的概念并不如国籍明确,有可能给判断带来困难。

对于遗嘱继承的准据法,《通则法》区分三种情况作了规定:一是遗嘱生效的实质要件适用被继承人立遗嘱时的本国法;二是遗嘱的撤销适用被继承人撤销遗嘱时的本国法;三是对遗嘱的方式(即遗嘱的形式要件),日本将《海牙遗嘱方式法律冲突公约》转化为国内法,制定了专门的《有关遗嘱方式准据法的法律》。根据该法的规定,符合下列法律之一的,遗嘱方式即为有效:1. 行为地法;2. 遗嘱人立遗嘱或者死亡时国籍所属国法;3. 遗嘱人立遗嘱或者死亡时住所地法;4. 遗嘱人立遗嘱或者死亡时惯常居所地法;5. 不动产的遗嘱,依不动产所在地法。该规定符合国际上通行的“有利于遗嘱方式有效”的原则。

侵权

(一)原则上损害结果发生地取代了原因事实发生地

在侵权行为法律关系适用的规则上,当前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为,同维护侵权行为地的公共秩序相比,受害人所受损失的填补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日本此次国际私法改革即受到该种观点的影响。《法例》对侵权行为法律关系适用所确定的连接结点是“原因事实发生地”,即侵权行为地;但“原因事实发生地”的含义颇具争议,有时不易确定。《通则法》作了修改,规定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法,但如果加害人不能预见损害结果在该地发生的,则应适用加害行为实施地法。“加害人不能预见”是指对结果发生地的不能预见,而非损害结果的不能预见。

(二)特殊类型侵权

《法例》仅规定了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原则性条款,对于特殊类型的侵权并没有专门规定。《通则法》分别第18条和第19条就产品责任和名誉或者信用侵

害责任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对于产品责任,日本主流的观点认为应适用市场地法。一方面,市场是生产者与受害者(产品取得者)的交汇点。市场地与双方当事人均具有较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市场地法对双方当事人而言具有中立性,适用该法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第18条将最终消费者取得产品的地方视为市场地。产品责任原则上应适用受害人取得产品地法。但是,出于对生产者利益的合理保护,在通常情况下无法预测产品在该地交付的,则适用生产者的主要营业所在地法。

对于由侵害他人名誉或者信用而产生的侵权责任,《通则法》第19条规定应适用受害人惯常居所地法,受害人为法人及其他社团或者财团时,则适用其主要营业所在地法。适用受害人惯常居所地法,不仅是为了保护受害人,也考虑到适用该地法律对加害人而言也具有一定的预见可能性。同时,即使对受害人名誉或信用的侵害发生于多个法域,通常在受害人惯常居所地造成的损害后果也是最大的。


(三)最密切联系和当事人意思自治

适当地增加侵权法律适用规则的灵活性为日本此次国际私法改革所关注,该灵活性体现在连接点的软化以及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引入上。

除了损害结果发生地作为一般原则外,《通则法》规定了两种情形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地作为特殊规则:一是当事人在同一法域具有惯常居所;二是侵权系违反当事人间已有合同义务(或称合同和侵权的竞合)。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如当事人共同居所地法等)。

在侵权法律适用领域,传统上各国一般都基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考虑,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然而,近来的发展趋势却是强调侵权的私益性质,侧重对受害人损失的填补及当事人之间利益的调整,加之因侵权产生的债权多表现为金钱债权,可由当事人自由处分。当前国际上的主流观点认为,在侵权法律适用领域,应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通则法》反映了这一趋势,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变更根据法定连结而确定的准据法。

(四)双重可诉规则

《法例》规定了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法院地法和外国准据法的双重适用。此次日本国际私法改革,该项规则仍继续保留。该项规则受到日本学术界的普遍批评,日本参议院在《通则法》(附带决议)中说明,该问题是“将来法律修改的课题”。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

杯中世界

文 / 廖盛芳

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海量的人,夸张一点,可以说千杯不醉。但这些日子,只一杯就让许多中国人醉得手舞足蹈,醉得脸红脖子粗。这个杯叫作世界杯。世界杯每届只有一个得主,但全世界都跟着沾光。中国队未能获得到南非去角逐本届世界杯的资格,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对世界杯而疯狂,为世界杯而陶醉。而在国外,那杯子所引发的醉态比起国内的情况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能让地球上那么多人陶醉,那杯中装的当然不是普通之物,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那杯里盛着的是世界。

世界在变小,不过还是不太好把握,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的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世界杯来了,人们变得活跃起来。球场内外到处是舞台,来自不同角落、有着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人,纷纷出来表演。人们的表演使世界变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充满魅力。

在这个富有魅力的世界里,人们看到了足球。在南非,一个名为“普天同庆”的小圆球,凝聚了地球上无数人的激情,吸引了地球上无数人的目光。于是,运动员来了,球迷来了。足球在运动员的激情中飞来飞去,淋漓尽致地展示着人类的力量、智慧和勇气,球迷们为之摇旗呐喊,为之翩翩起舞,为之心潮澎湃。运动员和球迷用他们的激情诠释了“普天同庆”的含义,把世界杯比赛变得如同过节一般。

带着激情,足球流氓也来了。英国足球流氓以其以往的“非凡”表现而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对待。英国警方把他们列入了监控名单,举办国际性赛事的国家、地区的警方,对他们严阵以待,有的根本不允许他们入境。为了防止英国足球流氓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闹事,南非提前阻止了四十多名早已“世界闻名”的英国足球流氓入境。但是,英国足球流氓到底还是来了,而且显出了其流氓本色。在英格兰队对阵美国队的过程中,一名英格兰“流氓球迷”在看台上把一名美国球迷打得血流满面,只是由于现场工作人员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冲突。眼看着英国足球流氓“出尽风头”,

阿根廷的足球流氓也不甘寂寞。在阿根廷国内,每年都会有无辜的人在他们的打斗中丧生。如今,他们走出国门,来到南非施展拳脚。在本届世界杯上,他们的表现比英国的足球流氓更加“风光”。他们在约翰内斯堡一家饭店制造的骚乱使他们迅速出名。结果是他们中有几十人被南非警方驱逐。

足球流氓受到的是法律的抵制,各国普遍完善了法律以应对足球流氓的种种行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对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行为的处罚,这条规定就是对付足球流氓的有力武器。这样的武器各国都有,英国监控足球流氓,南非驱逐足球流氓,用的都是类似的武器。遭到南非警方驱逐的阿根廷足球流氓中有7人返回阿根廷后向司法部门提



摄影/魏征

这些日子,只一杯就让许多地球人醉得手舞足蹈,醉得脸红脖子粗。这个杯叫作世界杯

交诉状,要求取消对他们的旅行禁令,使他们能够重返南非,法官胡安·帕迪亚依据法律拒绝了他们的申请。可见,各国的法律武器在原理上还是相通的。

对足球流氓的打击体现出了法律的精神。足球流氓往往是“性情中人”,他们心中往往满怀激情,这种激情是足球运动所需要和欢迎的。法律是理智的产物,不可能由激情产生,但法律并不反对激情。有了激情不妨化为音乐和舞蹈,甚至还可以把激情喊出来,只要不影响到别人,法律就不会反对。法律反对的是把激情释放在破坏公共秩序、损害他人权益上的做法。法律是调整人与人的社会规范,这意味每个人在为人处事时都必须顾忌到他人和社会。足球流氓只顾自己发泄,心中没有他人和社会,这明显是在跟法律过不去。打击足球流氓,和打击酒后驾驶基本是一个道理。爱喝酒的人一般也是“性情中人”。法律一般情况下并不反对喝酒,一个人醉倒在家门口一般也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前提是不能超出个人权利自由的限度。酒后驾驶显然超出了这样

的限度,它给他人和社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安全威胁,而安全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世界杯期间各国酒的销量都明显增加,因此各国普遍对酒后驾驶保持高压态势。我国公安部门加大了巡查的力度,北京市交管局表示,世界杯期间,对酒后驾车将依法高限处理,对醉酒驾车司机一律依法拘留。河南周口人马力争“以身试法”,他因此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幕之后北京第一个走进拘留所的醉酒司机。除了拘留之外,马力争还被依法记了12分,并要接受1800元罚款,暂扣驾驶证6个月。

世界杯期间,法律的精神也体现在对赌球的打击上。法律的本意是要使人类的理智更加健全,使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健康,使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赌博活动恰恰与此相反,一旦涉赌,人们往往在输赢间失去理智,并使正常的人际关系变得紧张,有的甚至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此,赌博在亚洲许多国家是被禁止的行为。赌球,特别是网络赌球,更是打击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大约2300多个与足球博彩相关的网站。有机构预测,世界杯期间,全球将有十亿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赌球,赌球金额将达到几百亿欧元。有鉴于此,各国普遍加强了对赌球活动的治理。据有关部门通报,从今年1月到6月12日,我国各地公安机关已侦破网络赌球刑事案件740余起,刑拘、批捕累计3600余人;查处治安案件1980余起,治安处罚4100余人,查扣、冻结赌资7亿余元人民币。博彩,在一些西方国家是一种产业,是合法的。但合法并不等于就可以乱来。实际上,西方国家对博彩活动有着严格的规范,超出这个规范就是非法的。各国都把非法赌球视为毒瘤,必欲除之而后快。

打击非法赌球,不仅仅是为了消除非法赌球本身的危害,也为了使足球运动更加健康。非法赌球不是孤立的存在,赌博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钱,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操纵和影响球赛结果上,从而控制盘口,操纵赔率,获取暴利,这已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担忧,也引起国际足联的警惕。在本届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建立了一套“预警系统”,该系统目前已经与400多家博彩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这样做,目的在于使世界杯更富有足球精神。使人和物各顺其性,使人更像人,足球更像足球,这正是法律所追求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球”是有效果的,英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为博彩业立法前,运动员、教练员收受贿赂打假球的现象屡见不鲜。博彩业立法后,赌球逐渐合法化、公开化,时至今日,英国已基本消灭了黑哨、假球的现象。

法律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打击非法上,也体现在其他方面,看看本届世界杯主办国南非的情况就能明白

这一点。

南非是一个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有比较健全的体育法制,不仅制定了体育基本法——南非体育与娱乐法,而且制定了体育领域反兴奋剂机构法、彩票法、非盈利组织法等一系列体育单行法。获得2010年世界杯承办权后,南非完善了相关体育法制,不仅针对2010年足球世界杯制定了专门法规,还对与世界杯相关的法律进行了特别修正。南非相关法律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便利的法律服务举措,法院系统则在9个赛区的法院设立了54个专门的世界杯法庭,以处理世界杯期间相关的诉讼。南非还根据国际足联的要求和世界杯的需要,健全了纠纷解决机制。目前南非世界杯各项赛事进展基本顺利,南法律的作用功不可没。

世界杯足球赛本身也充分体现了法律的精神。世界杯比赛通过电视转播传播到千家万户,在让观众享受到“豪门盛宴”的同时,也使观众有机会参与评头论足,并为世界杯各项事业的发展贡献才智。民众的广泛参与正是现代法律所要求的。法律的精神从世界杯规则的变化上也可看出来。世界杯比赛的判罚尺度、红黄牌制度、裁判的安排等都在朝着提升足球精神、体现公平的方向发展。最近,国际足联正式宣布修改红黄牌的规则,新的红黄牌规则增加了球星参加决赛的机会,有助于增强世界杯的魅力,提升足球的精神,因而世人普遍为之叫好。这项规则的修改也意味着人们在观念上变得更加宽容。球星对足球运动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足球场上的标兵,但标兵也可能犯错误。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让小组赛上领到红黄牌的球星参加决赛,这样的做法符合法律的精神。法律希望人们所从事的活动能够符合该活动的宗旨,但并不保证每个人的每个行动都十全十美。对待球星是这样,对待裁判同样如此。当两个人争持不下时,由第三方说了算,这是法律的基本要求,所以法律精神天然蕴含着裁判的权威。这个权威在世界杯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裁判是足球场上的法官,在比赛中,他们的判罚被球员和观众视为错判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并不影响判罚的“既判力”,笔者未听说因为不服世界杯赛上的某个判罚而反复“上访”的情况。如果有人因为不服判罚而闹事,将被视为足球流氓。

好好欣赏一下世界杯,会发现这个杯中确实装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既能看到足球,也能触摸到法律的精神。

我国足球的现状难以让人满意,与足球领域的法治状况有一定关系,要实行“依法治球”,不妨深入世界杯的世界,去品味和借鉴其中的法律精神。这有助于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法治事业也是有益的。★

江西省进贤县人大常委会关注返乡农民工就业

为有效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江西省进贤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开展专题调研活动,科学建议并依法监督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在农民工返乡潮之初,进贤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了6个调研小组,先后深入全县21个乡镇和各部门就农民工返乡就业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随后,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符合该县实际情况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引起了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监督县政府落实建议的同时,进贤县人大常委会还鼓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积极帮扶返乡农民工。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进贤县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通过多种渠道促成再就业的返乡农民工达到了2000多人。(徐建华 万祖峥)✎

江西省广丰县人大常委会关注卫生事业发展

为进一步推进广丰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近期,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对村卫生所、个体诊所和民营医疗发展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到县卫生局、部分乡镇卫生院、公立医院、私立医院等进行调研。

调研组认为,村卫生所、个体诊所和民营医疗的发展较好地改善了农村群众的就医条件,方便了广大群众的就医。同时,指出部分医务人员素质不高,存在非法行医,医疗废弃物处理不当,监管力量不够强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调研组建议:提升执法监管能力;建立和健全村卫生所、个体诊所和民营医疗机构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加强日常监管;严厉打击和取缔非法行医现象;依法加强医疗废弃物管理等。(严剑飏 吴袁菊)✎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首次网络直播立法审议过程

近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将分组审议《湖北省就业促进条例(草案)》的过程通过网络进行了直播。据悉,通过网络直播省级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地方性法规的过程,把会议实况“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公众,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对此,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龚良柏认为,这既能方便公众“旁听”会议,也利于公众了解省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审议过程,促进立法机关更加民主立法,增强常委会组成人员责任感以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

据了解,为了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还将该条例草案的修改稿全文公布在网上征求意见。截至对条例(草案)进行二次审议时,收到反馈意见和建议达500余条。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认真吸纳这些意见和建议,对原条款作了针对性的修改,社会公众的意见得到了充分反映。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范兴元说,实行民主立法,促进科学立法,通过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广泛征求民意,充分集纳民智,让公众了解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体现。(王艺园 陈宓夷 王新风)✎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调研民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近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文海英率调研组在寿县调研少数民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研组一行实地视察了陶店回族乡中心村街道亮化、绿化、硬化工程



以及民族村康居点等建设情况,并召开了民族工作座谈会。调研组指出,少数民族乡村要立足自身,正视困难,抓住机遇,增强信心。调研组强调,要充分利用外部各种有利条件,主动与对口帮扶单位加强联系,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农业资源,找到符合自身产业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产品,做大做强做成规模,做足“农”字品牌文章,加快农业产业化,拉长产业链条,并积极做好包装推介。(韩大鹏摄影报道)✎

江苏省沭阳县人大常委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去年以来,沭阳县人大常委会重点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规划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义务教育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8部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在检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情况时,检查组通过实地察看、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明查暗访、分组检查等方式,了解和掌握存在的问题,并形成了执法检查报告。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报告中代表所提建议极为重视,逐项对照,明确整改内容,落实牵头单位和责任人,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通过共同努力,全县交通环境大大改善,城区各交通道口全部配齐了红绿灯,新增公交站亭58个,北京路、上海路等12条道路相继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既从根本上改善了老城区的交通压力状况,又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形象和环境品位。此外,县常委会还积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多部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单晓红)✎

重庆市丰都县人大常委会加强监督工作

最近,重庆市丰都县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了《丰都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材料报送处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本着“围绕中心、服务发展、依法监督、增强实效”的原则,以条款的形式对人大常委会审议议题的确定、议题调研检查、审议材料形成、会前分送、审议成果、会后追踪落实等工作流程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尤其是明确了会议审议材料各个环节办理的时间、程序、责任及工作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该办法的出台,对于增强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规范性,提高人大监督实效,具有重要意义。(隆厚文)✎

山东省肥城市老城镇人大代表视察校园安全工作

6月3日,肥城市老城镇人大主席团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全镇19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校园安全工作进行了专项视察。视察组听取了镇教育工作站的工作情况汇报,深入学校和幼儿园就校园安全问题同学校负责人和老师进行了座谈,并征求了部分学生家长的意见。视察组对这些学校为校园安全所采取的工作措施给予充分的肯定。代表们对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工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始终绷紧校园安全这根“弦”;二是做好应急预案,确保师生人身安全;三是公安、司法和治保部门要各负其责,加大对校园周边环境的清查力度,整治各类不安全因素。同时,加大投入,有条件的安装电子监控设施,确保技防措施的安全有效。(于树军 王民)✎

天津市滨海新区各人大代表小组组建完毕

为加强滨海新区人大代表工作,便于组织人大代表开展各项活动,更好地发挥代表作用,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于今年3月份开始筹备组建各人大代表小组。目前,滨海新区街、镇和功能区20个人大代表小组已于4月份组建完毕,确定了代表小组组长、副组长、成员和秘书。人大代表小组的建立,既加强了区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又夯实了人大工作的基础,为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和发挥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激发和调动了人大代表参加活动、履行职务的积极性,有利于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增强代表工作实效。人大代表小组建立后,代表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利用好代表小组这个平台,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作用,为天津滨海新区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侯明)✎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大代表视察反渎职侵权犯罪工作

近日,常德市鼎城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十余名市、区人大代表视察了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犯罪工作。代表们先后视察了该院的文化建设情况和办案工作区。在座谈会上,区检察院的主要负责人分别向代表们汇报介绍了该院近年来的反渎职侵权犯罪工作情况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及开展相关专项活动的情况。座谈会发言中,代表们充分肯定了区检察院近年来的反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同时也提出了要强化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共识度和干警的办案能力;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渎职侵权犯罪;突出工作重点,全力推动反渎职侵权工作;完善监督机制,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监督体系等四个方面的建议。区检察院主要负责人表示,对代表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一定认真研究落实,希望代表们一如既往地监督支持该院的包括反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促进检察机关更好地为全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周跃华 伍俊华)✎

陕西省千阳县人大常委会为人民陪审员履职助力

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赋予了人民陪审员非常重要的权力。人民陪审员职责行使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审判工作和司法公正。为了确保新任命的人民陪审员正确行使职权,千阳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县人民法院、司法局,对任命的19名人民陪审员进行了履职培训。培训会上,大家认真学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及有关选任、培训、考核、参加审判活动的规定,之后通过了千阳县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县人大常委会对任命的人民陪审员提出了五点要求: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意识、认真学习掌握审判业务知识、正确处理审判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保证执行职务的各项权利。通过培训,使新任的人民陪审员深受履职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履职责任感,表示不负人民的重托,尽职尽责履行职责,为民司法,维护稳定。(王志芳)✎

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人大常委会调研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

为全面了解全区教育均衡发展现状,近日,复兴区人大常委会成立了由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组成的调查组。对复兴区教育均衡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了解。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的基础上,先后深入到部分学校和建筑工地分别就学校软硬件建设及新校址的预留情况进行了实地察看,召开了由部分教师、小学校长和辖区中学校长参加的座谈会,详细了解了复兴区学校的基本情况和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广泛收集了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建议。针对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教师队伍结构矛盾突出、中小学布局不尽合理、新建小区的学校规划难以落实等问题,提出了要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等建议意见。(张学华 王斌斌)✎

建设“全国性现代化全能型上市银行” ——成都银行

成都银行成立于1996年12月30日。作为四川省首家城市商业银行，多年来该行依法稳健经营，严格规范管理，已逐步发展成为一家规模初具、运行稳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截至2009年12月31日，总资产由成立时的48.2亿元增长为1043亿元，增长22倍；存款余额由成立时的39.7亿元增长为914亿元，增长23倍；贷款余额由成立时的26.3亿元增长为549.7亿元，增长21倍。总资产在中西部城市商业银行中率先突破1000亿元大关，成为全国第14家资产过千亿的城市商业银行，经营规模和综合实力连续4年位居中西部城市商业银行首位。目前，该行注册资金32.51亿元，实行一级法人体制，全行下辖117家分、支行及网点，正式员工2242名。

近年来，在“二次创业”、“五年规划”发展新思路的指引下，成都银行努力开拓创新，不断深化改革，各项业务实现了年均30%以上的增长，经营利润连年翻番，连续跻身“全球商业银行1000强”、“亚洲银行300强”、“中国银行业100强”等国内外商业银行综合实力排行榜。在2010年2月公布的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中，成都银行综合竞争力位居中等规模银行（规模在100-400亿美元之间）第16位。

为适应城市商业银行新的发展要求，该行多年来稳步推进增资扩股、更名、跨区域经营、多元化经营、公开上市等多项战略举措，先后于2007年引进马来西亚丰隆银行等境内外投资者，一次性引入资金60亿元，顺利完成增资扩股；2008年由“成都市商业银行”正式更名“成都银行”，为发展为区域银行奠定基础；2009年开设首家异地分行——广安分行，实现跨区域发展实质性突破；2010年与战略投资者丰隆

银行共同发起设立国内首批、中西部第一家消费金融公司——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实现多元化经营初步探索；2010年成功开设首家省外分行——重庆分行，与此同时全力推进西安、深圳等分行筹建工作，在力争用3-5年时间使该行分支机构基本覆盖中西部主要中心城市和省内多数市（州）的同时，逐步进驻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此外，成都银行公开上市前准备工作也正顺利推进。一系列战略举措的稳步实施，使成都银行向建设“全国性现代化全能型上市银行”目标稳步迈进。

成都银行始终坚持“服务区域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广大市民”的市场定位。该行先后投入大量信贷资金，不断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为成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金沙遗址、宽窄巷子历史文化保护区开发、都江堰青城山景区改造等重大文化旅游项目，都留下了。为支持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该行多年来给予大量信贷资金大力支持县域经济及“三农”经济发展，同时加大在成都郊区县市开设支行力度，目前该行下设网点已基本覆盖了全域成都，未来该行还将在成都重点城镇增设郊县支行下属网点，为进一步加大支持县域经济力度打下基础。

成都银行始终专注于服务广大最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客户，积极打造“中小企业伙伴银行”。该行在全市率先成立中小企业部，并设立3家专营支行，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专业服务。为解决本地中小企业还款难的问题，成都银行为中小企业量身订做了多项个性化、多样化的还款方

式。为探索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新路子，该行对中小企业新型质押手段作了深入的研究，全市率先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业务等新型业务品种。

为践行“市民银行”的承诺，成都银行持续开展优质服务活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该行先后有多个营业网点荣获全国、省级、市级“青年文明号”集体荣誉称号以及银行业“文明示范窗口”称号。为关心市民福祉，该行锦程系列借记金卡始终免收账户管理费、跨行ATM取款、查询费，最大限度降低持卡人用卡成本，该卡连续三年蝉联“最受市民欢迎银行卡”奖。同时该行始终坚持现金代收水、电、气费以及固定电话费，免收小额账户管理费用，在全市率先推出储蓄延时服务，为市民在下班后办理银行业务提供便捷。此外，为支持全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成都银行在全市首推个人小额担保贷款业务。



总行大楼

洋浦经济开发区



海南炼化 30 万吨原油码头



“洋浦湾”集装箱轮

○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国务院于 1992 年批准设立的享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开发区现有面积 31 平方公里（规划控制面积 69 平方公里），人口 5 万。开发区位于海南省西北部的洋浦半岛，是中国面向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最前沿；是经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海运的第一节点和北部湾离国际主航线最近的深水良港；是距离南海石油天然气资源最近的工业开发区；是国家授予的首批六个石油化工类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之一。

近几年，按照“一港三基地”（以保税港区为核心的区域枢纽港、石油化工产业基地、制浆造纸及印刷包装一体化产业基地、石油及天然气储备基地）产业发展定位，积极推行“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高科技支撑，高环保要求”的发展战略，洋浦开发开放步伐日益加快。2009 年，全年全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4%；2004 年至 2009 年年均增长 31.6%。同时，主导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在建和投产工业项目 30 多个，港航物流、石油化工、制浆造纸、石油储备等主导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洋浦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对区内主要工业企业实施实时在线监测。近岸海域水质保持在二类以上标准，环境空气质量工业区保持在二级标准，生活区保持在一级标准。○

中国现代农业示范高地

——杨凌示范区



杨凌示范区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东距西安 82 公里，西距宝鸡 86 公里，面积 135 平方公里，其中国务院批准的示范区规划面积 22.12 平方公里，目前城市建成区约 16 平方公里，下辖一个县级杨陵区，有 4 乡 1 镇 1 个街道办事处，87 个行政村，总人口 20 万，其中城区人口约 8 万人。区内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批准成为向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十大工业园之一，是世界上农业科技力量、科技成果和农业高科技产业高度密集的地区之一，是陕西经济极具发展潜力的增长点和西部大开发的亮点，是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区，是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节点城市，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五大高新区和全国六个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之一。